

第一单元 从中华文明起源到秦汉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建立与巩固

中国是远古人类的重要起源地，中华文明是人类最古老的文明之一。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源远流长，生生不息，展现了自身发展道路的独特魅力。中国原始文化星罗棋布，多姿多彩，先后经历了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夏、商、西周是中华文明和早期国家的形成与发展时期，也是奴隶制社会的形成、发展与繁荣时期。春秋战国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大变动的时期，百家争鸣是这一变动的思想反映。秦汉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形成时期，奠定了大一统中央集权国家治理的基本模式。

通过本单元的学习，了解中华文明的起源情况以及早期国家特征；理解战国时期变法运动的必然性，了解孔子、老子学说与百家争鸣局面及其意义；认识秦汉时期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建立、巩固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以及秦朝崩溃和两汉衰亡的原因。

第1课 中华文明的起源与早期国家

一、石器时代的古人类和文化遗存

考古发现，人类最早制造的工具是石器。原始社会因石器制作技术的不同而被区分为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旧石器时代是指以打制方法制作石器的时代。中国已发现的旧石器时代人类化石点遗址有数百处，代表性的有距今约170万年的元谋人和距今约70万至20万年的北京人。他们从事渔猎和采集，过着群居生活。元谋人、北京人已经学会用火。

距今约1万年前，中国进入新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是指以磨制方法制作石器的时代。当时人们已经大量使用陶器，开始从事原始农业，饲养家畜，生活逐渐稳定。目前，中国已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有1万多处，且分布广泛，奠定了多元一体的发展基础。

距今约7000至5000年前，黄河中游地区进入仰韶文化时期，它的典型器物是彩绘陶器，以粟等为主要栽培作物。大致同一时期，黄河下游出现了大汶口文化，长江下游有河姆渡文化。河姆渡文化的居民种植水稻，并且掌握了养蚕缫丝技术。

距今约5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大汶口文化和仰韶文化被龙山文化所代替。龙山文化的代表器物是黑陶，胎壁薄如蛋壳，被称为“蛋壳陶”。同时，在北方辽河上游有红山文化，长江下游有良渚文化。它们都出土了精美的玉器，并且出现较大规模的祭坛和神庙。

中国原始社会经历了约200万年的历史，分为原始人群、母系氏族社会和父系氏族社会三个阶段。旧石器时代晚期出现的母系氏族社会，生产力十分低下，氏族成员共同劳动，成果共享。新石器时代晚期出现的父系氏族社会，社会贫富分化与不平等开始出现，氏族间的联系趋于紧密，形成较大的部落甚至部落联盟。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等考古发现表明，这时私有制已经产生，阶级分化日益明显，部落中出现了权贵阶层。他们通过战争不断争夺财富和权力，中国即将迈入阶级社会的门槛。

二、从部落到国家

古史相传，中国历史从三皇五帝开始。三皇时代较早，名称众说不一，神话色彩浓重。五帝的事迹较为具体。传说中居于五帝之首的黄帝，是黄河中上游一带的部落首领。他联合

另一部落首领炎帝，结成炎黄部落联盟，他们被后世共尊为华夏始祖。五帝中最后两位尧、舜，可能是中原地区的联盟首领。尧年老时，根据推举和他对舜的考察，由舜继承其位。这种做法称为“禅让”。考古学证明，大约相当于五帝后期的龙山文化时代，中国大地上邦国林立，史称“万邦”时代。有些邦国都城规模较大，如陶寺遗址中有宫殿建筑、天文建筑以及各种礼器，阶级阶层分化也比较明显，有专家认为其具备了国家的初始形态。

夏部族的禹因治水有功，接受舜的禅让，成为联盟首领。约公元前2070年，禹建立了我国最早的奴隶制国家夏朝。禹死后，其子启继位，世袭制代替了禅让制。夏王是最高统治者。中央设有主管行政、军事、司法和宗教的机构与职官。夏朝社会仍然是聚族而居。除对夏部族生活的地区实行直接统治外，夏朝对其他地方主要通过控制一些部族进行间接统治。考古学家在河南洛阳偃师发现的二里头遗址，很有可能是夏文化的遗存。

夏朝最后一个王桀，暴虐无道，百姓不断反抗夏朝的统治。约公元前1600年，商部族在首领汤的率领下，发兵讨桀，大败夏兵，把桀放逐到南方，夏朝灭亡。

三、商和西周

汤灭夏后建立了商朝。史书中有关商朝的记载，得到了考古发掘的验证。据载，商朝前期都城多次迁移，后来定于殷，所以商朝也称殷朝。考古学家在河南安阳一带发现殷墟遗址，在遗址出土的大批龟甲、兽骨上刻有文字。这些文字被称为甲骨文，主要是商人刻写的占卜记录。甲骨文是一种成熟的文字，经历了很长时间的发展演变。殷墟还出土了许多青铜器，造型雄奇，纹饰华丽。

商朝国家机构更加完善。商王是最高统治者，商王之下设有尹及各类事务官。商朝的国家管理实行内外服制。内服指商王直接控制的王畿地区，外服指商王间接控制的方国和部族。商朝的政治势力与文化影响东到大海，西及陇山，南跨江汉，北至燕山。

商朝晚期，社会矛盾尖锐。最后一个王纣，修建许多宫殿苑囿，终日饮酒作乐，生活腐朽，还作炮烙之刑残害臣民，引起共愤。公元前1046年，周部族的首领周武王率众伐纣，双方在商都南郊牧野展开激战。纣王临时凑集的奴隶阵前倒戈，引导周军攻进商都，纣王自焚而死，商朝灭亡。周武王建立周朝，都城在镐京，史称西周。

西周实行分封制与宗法制，史称“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形成了“天子—诸侯—卿大夫—士”金字塔型的等级结构，加强了周天子对地方的政治统治。宗法制与分封制相互补充，解决了统治阶级内部在权力和财产分配方面的冲突与矛盾。

公元前841年，周厉王贪财好利，为政暴虐，引发了“国人暴动”。周厉王出逃，大臣召公、周公共同执政，史称“共和行政”。公元前771年，西北游牧民族犬戎乘西周王室内乱，攻破镐京，杀死周幽王，西周灭亡。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洛邑。

商和西周是我国奴隶制社会经济发展并走向繁荣的时期。农业是主要生产部门，农业生产中主要使用木、石、骨、蚌等材质的工具，青铜农具极少。商和西周实行奴隶主土地国有制，周天子名义上占有全国的土地和臣民，土地不能随意买卖。历史文献中所说的井田制是土地经营的基本方式，因土地整治规则，有沟渠灌溉、道路疆界划分，形似“井”字而得名。青铜铸造是手工业生产中的主要部门，青铜器种类繁多，劳动人民创造了灿烂的青铜文化。

第2课 诸侯纷争与变法运动

一、列国纷争与华夏认同

东周分为春秋、战国两个阶段。春秋时期，一些大的诸侯国扩张势力，力图号召和控制中小诸侯国，确立霸主地位。齐国、晋国、楚国、吴国与越国等先后建立了霸权，史书将这一时期建立霸权的诸侯国国君统称为“春秋五霸”。

春秋后期到战国前期，一些诸侯国的卿大夫掌握了实权。晋国的韩、赵、魏三家大夫将晋国瓜分，齐国大夫田氏也取代了原来的姜姓国君。经过长期纷争，许多中小诸侯国消失了，形成了齐、楚、燕、韩、赵、魏、秦七个大国，史称“战国七雄”。周朝传统的政治秩序完全被破坏，各国国君纷纷称王，周王室也在公元前256年被秦国吞并。

从春秋到战国，民族关系出现了重要变化。春秋时期，中原各国因社会发展比相邻的戎狄蛮夷先进，自称为“华夏”。在频繁往来和密切联系中，这些民族也产生了华夏认同观念。进入战国之后，戎狄蛮夷逐渐融入华夏族。华夏族吸收了大量新鲜血液，更加稳定，分布更为广泛。

二、经济发展与变法运动

春秋战国时期的经济有重大发展。冶铁技术出现，铁制农具开始使用，牛耕也得到推广。各国纷纷兴建水利灌溉工程，如都江堰、郑国渠、芍陂。农业进步推动社会分工，促进了工商业的繁荣。战国时，手工业分工更加细密，货币流通广泛，各地涌现出一批人口众多、商贾云集的中心城市。不少工商业主聚集了大量钱财，有的富比王侯。

战国时期兼并战争日益剧烈，各国为了富国强兵，纷纷开展政治、经济、军事、社会制度改革。变法运动成为战国时期的一股潮流，各国通过变法，推动了社会转型，逐步建立起君主专制的政治制度。其中，秦国的商鞅变法效果最为显著。

商鞅变法开始于公元前356年。主要内容有：重农抑商，奖励耕织；奖励军功，剥夺和限制贵族特权；强制大家庭拆散为个体小家庭；“废井田，开阡陌”，授田于百姓；在民间实行什伍连坐，互相纠察告发；行政管理上普遍推行县制，县的主要官员由君主任免。后来商鞅被杀，但变法措施已深入人心。商鞅变法顺应历史潮流，集列国变法之长，是战国时期持续时间最长、涉及面最广、改革最为彻底的一次变法。变法使秦国国富兵强，为秦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

三、孔子和老子

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名丘，字仲尼，出身于春秋后期鲁国没落贵族家庭。孔子针对礼崩乐坏、社会动荡的形势，就伦理和政治重建问题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孔子思想的核心观念是“仁”，意为关爱他人，进而主张统治者顺应民心，爱惜民力，“为政以德”，通过以身作则的道德感化来治理国家。孔子对现实不满，主张恢复西周等级森严的礼乐制度，同时也承认制度随着时代变化应当有所改良。

孔子在教育方面成就显著。他以“有教无类”的思想办学，打破了过去贵族阶层垄断文化教育的局面，推动了私学的发展。相传孔子晚年对《诗》《书》《礼》《易》《春秋》等文献进行整理，后来这些文献成为儒家的经典，对夏、商、西周的文化传承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的主要思想和言论记载在由其弟子及再传弟子整理成的《论语》当中。

老子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姓李，名耳，字聃，春秋后期楚国人。他将天地万物本原归结为抽象的“道”。他指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追求天人合一，这是中国古代朴素的唯物论。老子的思想还包含着朴素的辩证法，揭示出事物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转化、对立统一的矛盾；认为物极必反，柔能克刚。老子在政治上也对现实不满，反对制度束缚，主张顺其自然，无为而治，甚至退回到小国寡民的时代。这些观点见于《老子》一书。

四、百家争鸣

春秋战国时期是社会大变革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促使阶级关系出现新变化，旧的贵族等级体系开始瓦解，新兴的士阶层崛起。他们提出了自己的政治社会主张和要求，试图影响现实政治。

各国统治者出于争霸需要，礼贤下士，争相招揽人才。士人周游列国，颇受重用。他们的活跃推动了学术文化的繁荣。当时出现众多学说、学派，各自提出对政治、社会乃至宇宙万物的看法，彼此论战辩驳，形成百家争鸣的思想文化繁荣局面。

战国时期儒家的代表人物为孟子和荀子。孟子认为人性善，提倡“仁政”。荀子认为人性恶，主张隆礼重法。道家的代表是庄子，崇尚逍遥自由。以邹衍为代表的阴阳家认为五行间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提出了“相生相胜”理论，这代表了中国古代对自然界朴素的科学认识。新出现的重要派别有墨家和法家，分别代表下层平民利益和新兴地主阶级利益。墨家的代表墨子提倡节俭，主张“兼爱”“非攻”，还提出了“尚贤”的政治主张。法家代表韩非主张以法为工具管理国家，控制臣民，体现了中央集权的政治思想。

百家争鸣是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经济发展、阶级关系变化在思想领域内的反映，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波澜壮阔的思想解放运动。它不仅为新兴的地主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而且成为后世中华思想文化的源头活水，影响十分深远。

第3课 秦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建立

一、秦的统一

长期战乱给社会带来巨大灾难，人民渴望安定统一。各地域经济的发展，要求打破政治分裂所带来的阻碍。这为统一准备了客观条件。

秦“据殽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地理位置优越，物质基础雄厚。数代秦王励精图治，广纳贤才，吏治较为清明。商鞅变法后，秦尊奉法家，奖励耕战，国家日益强盛，为日后秦的统一奠定了基础。

公元前230—前221年，秦国采取远交近攻策略，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相继灭掉东方六国，建立起第一个统一王朝—秦朝，定都咸阳。随后，秦朝又征服了南方越族地区，加强了对云、贵一带西南夷的控制。在北方，秦朝击退了游牧民族匈奴的进攻。公元前214年，秦朝在原有北方诸侯国旧长城的基础上，修筑了西起临洮、东至辽东的万里长城。

秦朝采取了一系列巩固中央集权的统治措施。秦朝最早确立皇帝制度。嬴政兼采三皇五帝名号，将新王朝的君主定名为皇帝，并通过许多具体规定和礼仪突出皇帝的独尊地位。嬴政自称“始皇帝”，史称“秦始皇”。皇帝对国家事务拥有至高无上的决定权。皇帝之下设三

公九卿，三公指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为主要辅佐大臣；九卿泛指分掌具体事务的诸卿。三公九卿组成中央政府。在地方彻底废除分封制，将战国时已经形成的郡县制在全国推广，设立郡、县两级行政机构，其主要官员由中央任免和考核。县以下设乡、里和亭，分别负责管理民众和治安。此外，秦朝还大规模推行巩固统一的措施，如统一车轨、文字、货币和度量衡，修驰道、直道，颁行法律，编制户籍，迁徙六国贵族豪强到关中、巴蜀等地，整顿社会风俗等。秦朝确立的政治制度被以后的王朝长期沿用，影响深远。

秦的统一，建立起“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幅员辽阔的国家。统一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客观需要。空前统一的封建国家促进了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推动了统一多民族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

二、秦朝的暴政

完成统一后的秦始皇，穷奢极欲，大兴土木，建造宫殿、陵墓。他花费巨额钱财求仙访药，以求长生不老。秦始皇兴师动众出外巡游、封禅，征发繁重，百姓不堪重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秦朝刑法严苛，人民摇手触禁，“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天下愁怨”，社会阶级矛盾严重激化。

秦始皇接受李斯的建议，下令将非秦国历史的史书，非博士官所掌管的《诗》、《书》、诸子百家著作等，在30天内全部交给官府焚毁，只有医药、卜筮、“种树之书”不在其列，先秦以来的许多珍贵文献毁于一旦。秦始皇以“或为妖言以乱黔首”的罪名，将460余名儒生方士坑杀。这就是“焚书坑儒”。焚书坑儒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恶劣的影响。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在巡行途中死去，秦二世继位。他残忍昏庸，实行严刑峻法，加重人民负担，致使阶级矛盾和统治阶层内部矛盾尖锐化，人民再也无法忍受下去，最终一场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爆发了。

三、秦末农民起义与秦的速亡

公元前209年，一队被派往北部边境的戍卒，在大泽乡遇雨受阻。按照秦朝法律，不能如期赶到戍地将被处死。这些戍卒于是铤而走险，在陈胜、吴广领导下“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发动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起义。陈胜自立为王，号为“张楚”。天下云集响应，起义迅速蔓延。陈胜起义失败，项羽、刘邦等领导的反秦势力却日益壮大。公元前207年，刘邦的军队进占咸阳，秦朝灭亡。

秦朝灭亡后，刘邦和项羽展开了长达四年的楚汉战争。刘邦“约法三章”，废秦苛法，善于用人，听取谏言，指挥得当；项羽刚愎自用，不善用人，赏罚不明，烧杀掳掠，加之分封政策失当，缺乏稳固的根据地，最终被刘邦击败。

第4课 西汉与东汉——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巩固

一、西汉的建立与“文景之治”

公元前202年，刘邦建立汉朝，定都长安，史称西汉。刘邦即汉高祖。

汉初统治集团吸取秦朝速亡的教训，尊奉黄老无为思想，采取“与民休息”政策，减轻

赋税、徭役和刑罚，提倡节俭，减少财政支出。文帝、景帝在位期间，经济得到了明显恢复，社会稳定，史称“文景之治”。

西汉初年的各种制度基本沿袭秦朝，史称“汉承秦制”，但地方行政制度采取郡县与分封并行制。刘邦在统一战争中分封了七个异姓功臣为诸侯王，他们拥兵自重，对中央集权造成严重威胁。不久，汉高祖将异姓诸侯王逐渐剪除，但又“惩亡秦孤立之败”，陆续分封了一批同姓诸侯王。这些诸侯王大者“夸州兼郡，连城数十，宫室百官同制京师”，而汉朝中央直接管辖的只有15个郡，这给汉王朝的统治和稳定埋下了隐患。汉景帝在位时，削减诸侯封地，引发了吴、楚等七国叛乱。但叛乱不得人心，三个月内即被平定。

二、西汉的强盛

经过60余年的休养生息，西汉国力强盛。汉武帝继位后，加强中央集权。政治上，颁布“推恩令”，成功削弱了诸侯王的势力；加强皇权，削弱丞相权力，设立直接为皇帝所掌控的中朝，尚书令的作用开始提升；确立以察举制为代表的新的官吏选拔制度；将全国划分为13个州部，分设刺史，负责对辖区内郡级官员及子弟和豪强势力进行巡视监察；任用酷吏治理地方，严厉打击豪强、游侠等社会势力的不法行为。经济上，改革币制，将铸币权收归中央；实行盐铁官营，由政府垄断盐、铁的生产和销售；推行均输平准，国家插手并经营商业贸易，增加收入，平抑物价；抑制工商业者，向他们征收财产税。思想上，接受董仲舒的建议，尊崇儒术。此后，儒学成为我国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

汉武帝在稳固边疆的基础上积极开拓疆域。汉初，匈奴势力强大，多次袭击汉朝边境。汉武帝任用卫青、霍去病为将，经过三次较大规模的战争，控制了阴山以南和河西走廊的大片区域。西汉在河西走廊设立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为配合对匈奴的战争，汉武帝派遣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了中西交通道路，大大促进了西域与中原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中国的丝织品沿着这条道路传向中亚、西亚、欧洲和北非，这就是著名的“丝绸之路”。公元前60年，西汉在乌垒城设置西域都护府，作为管理西域的军政机构。西汉对东南沿海和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治理，也比以前更加有效。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得到巩固加强。

三、东汉的兴衰

西汉后期，政治日趋黑暗，土地兼并严重，赋税徭役沉重，破产农民沦为奴婢或流亡，社会动荡不安。公元9年，外戚王莽夺取皇位，改国号为新，西汉灭亡。王莽针对西汉后期的社会矛盾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试图挽救社会危机，但措施不切实际，反而使社会矛盾更加激化。王莽统治末年，国家出现严重的旱灾和蝗灾，赤地千里，绿林、赤眉等农民大起义终于爆发。23年，绿林军在昆阳击败王莽军队主力。随后，绿林军攻入长安，推翻王莽政权。

25年，西汉宗室刘秀重建汉朝，不久定都洛阳，史称东汉，刘秀即汉光武帝。随后，刘秀又平定一些割据政权，实现全国统一。东汉初年，刘秀加强皇权，增强尚书台的作用；严格控制外戚干政；裁并郡县，裁减官吏，节省开支；整顿吏治，惩处贪污腐败；清查全国垦田、户口数量；释放奴婢；重视儒学。社会经济在稳定的政局下重新发展起来，史称“光武中兴”。

东汉中期以后，皇帝大多年幼继位，年寿不长。皇帝年少不能亲政，太后掌握朝政，实

际权力控制在外戚手中。皇帝逐渐长大，不满外戚干政，便依靠宦官铲除外戚势力，宦官又因此掌控

朝政，从而出现外戚宦官交替专权的局面。他们各谋私利，相互争斗，致使东汉后期政治腐朽黑暗。一些正直官员和士人不满现实，品评人物，抨击时政，称为“清议”。他们触犯了宦官利益，被诬陷为“党人”，遭到严厉镇压，史称“党锢之祸”。

东汉时期，豪强地主势力发展迅速，土地兼并严重，阶级矛盾日益尖锐。184年，张角创立的民间秘密宗教“太平道”的信徒，在多个地方同时发动起义。起义军头裹黄巾，称“黄巾军”。起义军虽然相继被官兵各个击破，但黄巾起义动摇了东汉王朝的统治基础。地方长官趁机拥兵自重，军阀割据局面出现，东汉政权名存实亡。

四、两汉的文化

两汉史学的代表性成就是《史记》与《汉书》。西汉司马迁撰写的《史记》，以本纪、表、书、世家、列传的形式，叙述了上起黄帝、下至汉武帝年间的历史，首创了纪传体通史体裁。《史记》文字精练，人物刻画与叙事生动，不虚美，不隐恶，是一部兼具史学和文学特色的不朽名著。东汉班固撰写的《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

两汉文学成就集中体现在汉赋、乐府诗上。汉赋是一种介于韵文和散文之间的文体，讲究铺陈排比，辞藻华丽。乐府是国家专管音乐的机构，乐府采集民歌修改而成的诗称为乐府诗，其中很多诗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真实情况。东汉民间流行五言诗，语言朴实、生动，传播广泛。

第二单元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民族交融与隋唐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发展

三国两晋南北朝包括三国、西晋、东晋十六国、南北朝几个阶段，除西晋外都处于分裂状态。尽管战火连绵，政局动荡，但社会经济在曲折中仍有发展，南方的开发初见成效，文化领域也有不少重要成果。汉族与内迁边疆民族从冲突到和平交往，逐步走向交融，推动了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发展。随后出现的隋唐统一王朝，国力强盛，疆域拓展，经济繁荣，民族往来和对外交往活跃，制度上也有重要建树，在当时世界范围内首屈一指。自唐朝中期爆发安史之乱起，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严重削弱，最终演变为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

通过本单元的学习，了解三国两晋南北朝政权更迭的历史脉络和隋唐王朝的鼎盛局面，认识这一时期制度演进、民族交融、区域开发和思想文化发展等新的成就。

第5课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政权更迭与民族交融

一、三国与西晋

东汉末年，曹操、刘备、孙权三大军事集团渐成鼎足之势。220年，曹操之子曹丕称帝，定都洛阳，国号魏，东汉灭亡。刘备、孙权也相继称帝。刘备仍用汉的国号，定都成都，史称蜀汉，简称蜀。孙权定都建业，国号吴。魏国国力较强，在三国鼎立局面中略占上风。蜀、吴两国则加强了对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治理。263年，曹魏权臣司马昭发兵灭蜀。266年，司马昭之子司马炎代魏称帝，国号晋，史称西晋。司马炎即晋武帝。280年，西晋灭吴，完成统一。

自东汉以来，西、北边陲的一些少数民族不断向内地迁徙。到西晋，内迁的少数民族主要有匈奴、羯、氐、羌和活动在长城一带的鲜卑。晋武帝死后，宗室诸王展开对中央权力的争夺，演化为内战。内迁少数民族卷入其中，并且逐渐主导了局势。316年，西晋被内迁匈奴贵族所灭。自此，中国历史又进入一个比较长的政权分立时期，起初是东晋十六国的割据，后来演变为南北朝的对峙。

二、东晋与南朝

317年，西晋宗室司马睿在建康重建晋朝，史称东晋。

自三国、西晋以来，一些声名显赫的士大夫家族世代把持官位，享受政治、经济等方面特权，形成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称为士族。逃到南方的几家北方高门士族先后执掌朝政，成为东晋政权的主要支柱。他们争权夺利，势力逐渐衰弱。420年，出身低级士族的武将刘裕夺取皇位，改国号宋。此后170年间，南方先后经历了宋、齐、梁、陈四个王朝，合称南朝。四个王朝均定都建康，加上先前在此定都的吴和东晋，又统称为六朝。

从西晋末年起，北方人民为躲避战乱，大批流亡南下，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技术，也充实了劳动力资源。东晋南朝时期，南方土地大量开垦，农作物品种增加，产量提高。手工业方面，纺织、矿冶、陶瓷、造船、造纸等行业都有明显进步。在江南开发的过程中，许多山区的少数民族也逐步与汉族交融。

东晋北边的疆域，大致到淮水为止。东晋南朝之交，一度将势力范围扩展到黄河南岸附近，但随后在军事上渐处下风，又退回到淮水一线。到陈朝，只能保有长江以南，上游又丢掉了四川和荆襄，在南北对峙中处于明显劣势，覆亡大局已定。

三、十六国与北朝

西晋末年到东晋时期，北方先后出现了一批割据政权，最主要的有 15 个，加上西南地区的成汉，合称“十六国”。其中大部分由内迁少数民族建立。它们都采用了中原模式的国号、年号，学习汉族的典章制度。在长期混战中，原有民族布局被打乱，各族之间频繁接触，差异慢慢缩小，但民族隔阂仍然广泛存在。4 世纪下半叶，氐族建立的前秦统一北方，随后大举进攻东晋，被击败于淝水。由于内部各族尚未充分交融，统治基础脆弱，强大的前秦政权在淝水之战后迅速崩溃，曾经稍显缓和的民族矛盾又加剧了。

4 世纪末，鲜卑拓跋部建立的北魏强大起来，于 439 年统一北方。5 世纪后期，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在位，大力推动民族交融。他将都城从平城迁到洛阳，迁到洛阳的鲜卑贵族一律将籍贯改为洛阳，死后不得归葬平城；以汉族服饰取代鲜卑服饰，朝中禁鲜卑语，统一说汉语；改鲜卑姓为汉姓，其中皇族拓跋氏改姓元；仿照魏晋以来汉族社会的士族阶层，将新改姓的部分鲜卑贵族定为一等高门，并鼓励他们与汉族高门士族通婚。这些改革措施顺应了北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趋势，大大缓解了民族矛盾，促进了北魏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为以后北方统一南方以及隋唐盛世的出现打下了基础。

6 世纪前期，北魏发生动乱，分裂为东魏和西魏，稍后又分别被北齐、北周取代。上述五个王朝合称北朝。北齐、北周东西对峙，北周内政修明，逐渐占据优势，灭掉北齐。不久，隋朝取代北周，统一全国，终于结束了长达数百年的分裂割据局面。

第 6 课 从隋唐盛世到五代十国

一、隋朝兴亡

581 年，北周外戚杨坚代周称帝，改国号隋，定都长安，是为隋文帝。他励精图治，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国力日强。589 年，隋文帝派次子杨广率军灭陈，结束了南北长期分裂的局面。文帝死后杨广即位，是为隋炀帝。

隋朝的各项建设较多，规模宏大。在长安、洛阳两都和地方广设的仓库，既包括供应朝廷粮食和物资的仓库，又包括备水旱赈济而遍置于乡间的义仓，积储丰富。隋炀帝兴建的洛阳城，宏伟壮丽，闻名于世；开通的大运河，贯通南北，对巩固统一、促进南北经济交流以及运河沿岸城市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隋炀帝自恃强盛，大兴土木，穷奢极欲，又三次大举征伐高丽。生产遭到严重破坏。民不聊生，最终引发大规模起义。隋朝贵族李渊趁机在太原起兵。618 年，隋炀帝在江都被部将杀死，隋朝灭亡。

二、唐朝的繁荣与民族交融

618 年，李渊在长安称帝，建立唐朝，是为唐高祖。随后，唐军逐渐消灭各支起义军和割据势力，统一全国。继位的唐太宗李世民吸取隋亡的教训，轻徭薄赋，劝课农桑，戒奢从简，知人善任，虚怀纳谏。在他统治时期，国家出现了少有的开明政治局面，史称“贞观之治”。

唐高宗在位时，皇后武则天参与朝政，高宗死后不久，她废唐称帝，改国号为周。在她当权期间，社会经济持续发展。武周政权结束后不久，唐高宗之孙李隆基即位，是为唐玄宗。

他选贤任能，改革吏治，发展生产，大兴文治，改革兵制，将唐朝推向全盛时期，史称“开元盛世”。这一时期，经济有很大发展，社会空前繁荣。

唐朝时，周边各族迅速发展。突厥是兴起于阿尔泰山地区的游牧部落，6世纪中叶建立政权，后分裂为东、西突厥。

隋末唐初，东突厥多次南下进攻。贞观初年，唐军大举反击，击败并俘获东突厥可汗，东突厥汗国灭亡。草原各族共同尊奉唐太宗为“天可汗”。后来，唐高宗联合回纥灭西突厥。唐朝中央政权加强对西域的管理，先后设置安西都护府和北庭都护府，统辖天山南北。682年，安置在北方的东突厥部众反叛唐朝，一度建立了后突厥汗国政权。744年，唐朝与漠北回纥、葛逻禄等联手平定了后突厥汗国。从此，突厥在中国北方退出了历史舞台。

7世纪前期，吐蕃赞普松赞干布统一青藏高原。他多次遣使向唐朝求婚，唐太宗把文成公主嫁给他。文成公主入藏时带去大批手工艺品和多种技术、医药书籍等。唐蕃和亲，促进了汉藏的友好关系和经济文化交流。9世纪前期，吐蕃与唐会盟，此后，唐蕃间基本上停止了纷争。唐玄宗统治时期，东北的靺鞨族粟末部强大起来。唐玄宗封其首领大祚荣为渤海郡王。唐朝周边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对祖国边疆地区的开发作出了积极贡献。

三、安史之乱、黄巢起义和五代十国

开元年间，边疆形势随着版图的拓展日益紧张。唐玄宗在边境重地增置军镇，加强边防，军镇长官节度使兵力随之扩大。至唐玄宗统治后期，国家出现外重内轻的局面。此时的唐玄宗沉湎于享乐，怠于政事，任人唯亲，朝政趋于腐败。

755年，身兼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在范阳起兵，和他的部将史思明一起发动叛乱。这场叛乱历时八年，后被唐平定，史称“安史之乱”。在平叛过程中，唐军许多将领拥兵自重，中央集权被削弱；边防空虚，吐蕃趁机占领河西陇右地区。从此，唐朝由盛转衰。

安史之乱期间和以后，唐朝陆续在内地增设藩镇。藩镇管辖地区，大者十余州，小者三四州，有些藩镇独立性很强，形成藩镇割据的局面。这种局面在唐朝后期持续了100多年，严重削弱了唐朝的统治力量。

唐朝后期，宦官专权和朋党之争加剧。875年，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爆发。起义军横扫大半个中国，一度攻占长安，沉重地打击了唐朝的统治。黄巢起义军的将领朱温降唐，被封为节度使。他与其他藩镇联合镇压黄巢起义，逐渐控制政权。907年，朱温废唐称帝，国号梁，史称后梁。唐朝灭亡。此后50多年间，黄河流域先后经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短命王朝，称为“五代”。五代除后唐定都洛阳外，其余都定都开封。同时，南方各地先后出现吴越、南唐等九个割据政权，连同五代末期在山西建立的北汉，称为“十国”。

到五代十国后期，后周世宗柴荣顺应当时形势，努力清除五代的弊政，实力逐渐增强，为后来北宋结束五代十国分裂局面奠定了基础。

第7课 隋唐制度的变化与创新

一、选官制度

曹魏创立了新的选官制度九品中正制。中央委任中正官为各地人才评定等级，共分九等，朝廷依此授以相应的官职。选官标准从初创时期的重视家世、道德和才能，演变为西晋时期

主要看重家世。这样，九品中正制逐渐成为维护士族特权的工具。随着士族的没落，九品中正制无法继续。

隋朝建立后，废除九品中正制，开始采用分科考试的方式选拔官员。隋炀帝时，始建进士科，科举制度形成。唐朝继承和完善科举制度。唐太宗增加了考试科目，以进士和明经两科为主；武则天扩大科举取士的人数，首创了武举和殿试；唐玄宗任用高官主持考试，提高了科举考试的地位。

科举制使出身社会中下层的读书人通过相对公平的考试参与政权，扩大了统治的基础，提高了官员的文化素质，加强了中央集权。

二、三省六部制

魏晋南北朝时期，尚书台改称尚书省，与中书省和门下省形成三省，它们共同辅助决策，行使权力。

隋文帝时，中央正式确立了三省六部制。隋唐时期，三省的职权分工明确，又彼此制约。中书省负责草拟皇帝的诏令；门下省负责审核诏令，有不妥者驳回；尚书省负责执行，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分工处理各项具体政务。三省长官共议国事，执宰相之职。唐太宗时常给品位较低的官员以宰相名号，扩大任用宰相的范围。宰相议事的地方叫政事堂，后改称中书门下。政事堂的设立，提高了工作效率，三省出现了一体化的趋势。

三省六部制的确立和完备，是中国政治制度的重大变革，对此后历朝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赋税制度

魏晋时期，开始实行租调制，按户征收粮和绢帛。北魏孝文帝改革，颁布均田令，规定一夫一妇每年纳粟为租，纳帛或布为调，受田农民承担定额租调。成年男子负担一定的徭役。唐初，将赋税征收对象定为21至59岁的成年男子。除租、调外，男子不去服徭役的可以纳绢或布代役，称为庸。以庸代役保证农民有较充分的生产时间，政府的赋税收入也有了保障。

天宝年间，土地买卖和兼并之风盛行，政府直接支配的土地日益减少，均田制无法推行，租庸调制也无法维持。安史之乱后，为了解决财政困难，780年，唐德宗接受宰相杨炎的建议，实行两税法，规定：每户按户等缴纳户税，按田亩缴纳地税，取消租庸调和一切杂税、杂役；一年分夏季和秋季两次纳税。

两税法简化税收名目，扩大收税对象，保证国家的财政收入。它“惟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改变了自战国以来以人丁为主的赋税制度，减轻了政府对农民的人身控制。

第8课 三国至隋唐的文化

一、儒学、道教与佛教的发展

汉武帝时期，儒学正统地位确立后，在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下呈现繁盛之势。魏晋南北朝时，东汉末兴起的中国本土宗教道教在民间广为传播，并受到儒学的影响，主张“贵儒”和“尊道”。佛教在中国盛行，也吸收儒、道的思想，渐趋本土化。作为主流统治思想的儒学，自身开始吸收佛教和道教的精神，有了新的发展。

隋朝时期，儒家提出儒、佛、道“三教合归儒”，主张以儒学为主，调和并吸收佛教、

道教的理论。唐朝统治者奉行三教并行政策，奉老子为祖先，道教最受尊崇。武则天时，佛教在社会上也有很大发展，形成不同宗派。其中禅宗的修行比较简便，易于传播，对后世影响最大。

佛教盛行，广修寺庙，耗费了大量的钱财，很多劳动力不事生产，严重影响到政府财政收入。这一时期，不断有人出来反佛，其中南朝无神论思想家范缜是最杰出的代表。他针对佛教宣扬的形神分离、形亡而神不灭的观点，提出人的精神和肉体是统一的，对佛教进行抨击。北魏、北周及唐朝等统治者几度灭佛，佛教文化遭受损失，但佛教的发展并未从根本上受到遏制。

佛教和道教的发展使儒学的正统地位受到挑战，唐中期韩愈率先提出复兴儒学。他从维护封建统治出发，用儒家的天命论和封建纲常来反对佛教的观点，巩固儒学主流思想的统治地位。

二、文学艺术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有了很大发展，从东汉末年开始，先后出现了以曹操父子为代表的建安文学、东晋陶渊明的田园诗、南朝骈文、南北朝民歌等风格各异的文学形式。

唐朝是中国文学发展的又一个高峰。诗歌创作进入黄金时代。流传下来的有两千多位诗人创作的近五万首诗歌，很多脍炙人口的佳作，成为千古绝唱。李白、杜甫的诗作代表了唐诗的最高成就，他们分别被誉为“诗仙”和“诗圣”。

这一时期，书法、绘画、雕塑、舞蹈等大放光彩。书法在东汉末年成为一种艺术。魏晋南北朝时期，隶书、草书、行书和楷书等各种书体均已完备。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博采众长，诸体兼精，世称“书圣”。隋唐时期的书法艺术，融汇了南朝的秀美和北朝的雄健，创出新风格。颜真卿气势雄浑的颜体和柳公权骨力遒劲的柳体最为有名。

魏晋南北朝的绘画，成就斐然。东晋开始出现知名的专职画家，以顾恺之为代表。他提出“以形写神”，所画人物栩栩如生，《女史箴图》和《洛神赋图》是他的代表作。隋唐的绘画题材广泛，风格多样。宗教画生活气息浓厚，人物画注重表现人的形态，山水、花鸟也成为绘画主题。唐朝的吴道子被尊为“画圣”。

魏晋至隋唐时期，因佛教广泛传播而修造的石窟，如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甘肃敦煌莫高窟等，都是闻名世界的艺术宝库。

三、科技

魏晋南北朝时期，数学、农学和地理学等方面都取得了新的成果。南朝祖冲之精确地算出圆周率是在 $\overset{\sim}{3.1415926}—3.1415927$ 之间。北朝贾思勰著述的《齐民要术》，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完整的农书。西晋杰出地图学家裴秀绘制出《禹贡地域图》，并提出绘制地图的方法。

隋唐的科学技术进一步发展。隋唐时期是中国古代建筑的成熟期。隋朝工匠李春设计并主持建造的赵州桥，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石拱桥。唐朝已经有了雕版印刷的佛经、日历和书籍。唐中期的书籍记载了火药的配方。唐末，火药开始用于战争，火箭是最早的火药武器。唐朝天文学家僧一行，测算出了地球子午线长度。医学家孙思邈完成医学名著《千金方》，它全面总结历代和当时的医药学成果，且有许多创新。唐高宗时编修的《唐本草》，是世界

上最早由国家颁行的药典。

四、中外文化交流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佛教的传播和中外文化交流密不可分。从东汉到北朝，陆续有中亚、天竺的高僧来华，将大批佛经翻译成汉文。当时为了求得佛教真解，一些中国名僧西行取经。东晋的法显从长安出发，经西域至天竺，收集了大批梵文经典。唐朝的高僧玄奘，在贞观初年也西行前往天竺取经。他在天竺的佛教中心那烂陀寺钻研多年，又到许多国家周游讲学，成为公认的佛学大师。伴随佛教东传而来的异域文化，在很多方面对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国佛教的发展也影响到周边国家。唐朝高僧鉴真六次东渡，历尽艰险最终到达日本，传授佛法。日本、新罗等国常常派学问僧来长安求法，日本的空海就是很有名的一位高僧，他回国时携带了许多佛经和诗文集。这些交流对日本等周边国家的文化发展有着重要贡献。

唐都城长安聚集了许多国家和地区的使节、商人、侨民，成为当时的国际大都会。新罗、日本两国文化都受到唐朝的巨大影响。

它们向唐朝派遣了许多使节和留学生，有的留学生还在唐朝考中进士。唐朝后期，不少经海路来华的西亚商人在广州、泉州等港口城市定居。

第三单元 辽宋夏金多民族政权的并立与元朝的统一

辽宋夏金元是继三国两晋南北朝之后又一个北方少数民族活跃的时期，可分三个阶段：北宋与辽、西夏的对峙，南宋与金、西夏的并立，元朝的统一。宋朝强化中央集权，内部统治比较稳定，社会经济高度发展，学术文化也取得突出成就，但军事力量不振，与北方少数民族交战处于劣势。与这一时期的战争相比，各民族之间经济和文化联系更为持久和稳定，呈现出互相交融的趋势。元朝结束了多民族政权并立的局面，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王朝。这一时期，中国的经济、文化成就是在世界上仍处于领先地位。通过本单元的学习，认识两宋王朝在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等方面的新变化；了解辽夏金元诸政权的建立、发展和相关制度建设，认识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在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第九课 两宋的政治和军事

一、宋初中央集权的加强

960年，后周禁军统帅赵匡胤发动兵变夺取帝位，建立宋朝，定都东京，史称北宋。赵匡胤就是宋太祖。北宋建立后，相继灭掉南方的几个割据政权和北方的北汉，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统治者鉴于唐后期以来军阀割据、政局动荡的历史教训，有针对性地采取了一系列强化中央集权、维护政权稳定的措施。

为加强对地方的控制，中央派文官出任地方各州的长官知州，节度使逐渐变为虚衔；设诸路转运司统管地方财政，保证各州赋税绝大部分上缴朝廷；将地方精锐部队编入禁军，拱卫京师，镇守地方，定期更换驻地。

为分散机构权力，在中央，枢密院专掌军政，三司专掌财政，与宰相分权，并增设参知政事为副相。枢密院与禁军管理机构“三衙”分权，前者有调兵权但并不统兵，后者统兵但无权调兵。在地方，包括转运司在内，先后设立了平行的四个路级机构，从不同方面对各州进行监控和节制。州一级增设通判，与知州共同签署文书，彼此制约。

为抑制武将势力膨胀，北宋实行崇文抑武的方针，罢免宿将兵权，用文官担任枢密院长官；大力提倡文治，扩大科举录取规模，抬高文官和士人的地位。

这些措施强化了中央集权，有效地预防了内部动乱，巩固了国家的统一和安定。但“事为之防，曲为之制”，制度过于僵化，权力分割过细，也影响了行政效率，助长了因循保守的政治风气。

二、边防压力与财政危机

早在北宋建立之前，契丹族建立的辽朝在北方草原崛起，占领了燕云十六州，对中原形成严重威胁。北宋统一后，两次发起收回燕云十六州的北伐，均告惨败。后来辽军大举南下，兵临黄河北岸。双方签订协议，维持已有边界，辽宋皇帝以兄弟相称。北宋每年送给辽一笔钱物，称为“岁币”。通过这项协议，北宋获得了北部边防的基本安定。后来，北宋又与西北党项族新建立的西夏发生战争，也是屡战屡败。双方最终达成和议：西夏向北宋称臣，但实际上保持帝号；北宋每年送给西夏钱物，称为“岁赐”。

北宋在边疆战事中频吃败仗，却供养了一支空前庞大的军队。这支军队是通过招募组建的，多而不精，管理混乱，训练废弛，素质低下。军队不断扩编，导致军费直线上升，占到

国家财政开支的大半。另外，北宋政府机构设置重叠，官僚子弟入仕过滥，致使官僚队伍也不断膨胀。养兵和养官成为朝廷的沉重负担，财政状况日益恶化。

三、王安石变法

北宋的政治风气因循保守，行政效率低下。宋仁宗在位时，大臣范仲淹曾发起以整顿官僚队伍为宗旨的改革，史称“庆历新政”。新政明显触犯了官僚集团的既得利益，引发抵制，很快归于失败。

1069年，宋神宗任用王安石主持变法。变法涉及农业、商业、军事、科举、教育等诸多领域，基本原则是加强国家对这些领域的管理和控制，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富国方面，官府通过向农民提供农业贷款、拨巨资从事商业经营等手段，力图在调控经济的同时开辟财源；强兵方面，对农民进行编制管理和军事训练，希望借以逐渐恢复“兵农合一”的征兵制，取代募兵制。

王安石变法达到了富国目的，增加了大笔收入，但强兵的效果并不明显，北宋与西夏开战，又以失败告终。一些措施在执行过程中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也引起激烈争议。统治集团内部的分裂日益严重，北宋逐渐走向衰亡。

四、南宋的偏安

1127年，北宋被东北女真族建立的金朝攻灭，两位皇帝徽宗、钦宗被俘虏北去，史称“靖康之变”。北宋康王赵构在应天府称皇帝，后定都临安，史称南宋。赵构就是宋高宗。

南宋初年，宋军在与金军对抗中素质明显提高，形成几支较有战斗力的部队，尤以岳飞指挥的“岳家军”战绩卓著。然而，宋高宗和宰相秦桧却视岳飞等为心腹之患，主动向金朝求和。1141年，南宋与金订立绍兴和议。以东起淮水、西至大散关一线划界，南宋对金称臣，每年向金朝缴纳一笔财物，称为“岁贡”。岳飞也被南宋朝廷逮捕杀害。

此后，宋金之间又发生几次战争，南宋地位稍有上升，不再向金称臣，而是“世为侄国”，继续维持南北对峙的局面。

第10课 辽夏金元的统治

一、辽与西夏

辽朝的建立者契丹族与鲜卑同源，在辽河上游过着游牧、渔猎生活。916年，契丹族首领耶律阿保机建立契丹国，定都上京，后来版图扩大，改国号为辽。辽与北宋长期对峙，大部分时间里维持了和平局面，通使频繁，贸易活跃。

辽朝的职官设置分为南、北面官。南面官负责以汉人为主的农耕民族事务，北面官负责契丹等游牧民族事务。皇帝和宫廷依然保持草原习俗，每年随季节转换定期迁徙。迁徙中的行营成为国家政治中心。

西夏的建立者党项族是古代羌人的分支，唐末在今陕北、宁夏一带形成边疆藩镇，宋初仍然保持半独立的地位。1038年，党项首领元昊脱离宋朝称帝，定都兴庆府，国号大夏，史称西夏。其制度基本模仿北宋，中央机构除汉式官称外，同时有一套本民族称谓的官称。

北宋灭亡后，西夏向金朝称臣，仍然保持事实上的独立。

二、金朝入主中原

金朝的建立者女真族活动于黑龙江、松花江流域，以农业、狩猎、畜牧为生。1114年，女真族首领完颜阿骨打举兵反辽，次年称皇帝，建立金朝，定都会宁府，会宁府也称上京。1125年，金灭辽，两年后又灭北宋，与南宋逐渐形成对峙局面。1153年，金迁都燕京，将燕京改名为中都。

金朝基本沿袭唐宋制度，同时保持了一套女真民族的管理系统，叫作“猛安谋克”。凡女真民户，每三百户编为一谋克，十谋克编为一猛安。他们被大批迁入中原，在汉族村落之间筑寨居住，平时耕作，战时选拔丁壮出征。

12世纪后期金世宗在位，金朝进入鼎盛时期，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史称“大定之治”，世宗被百姓誉为“小尧舜”。世宗死后，金朝受到北方游牧民族的袭扰，猛安谋克又日益腐化，统治逐渐衰落。

三、从蒙古崛起到元朝统一

1206年，漠北蒙古部首领铁木真统一草原各部，建立蒙古汗国，被尊为“成吉思汗”。此后半个世纪，蒙古军队先后灭掉西辽、西夏和金朝，收服吐蕃诸部，兼并云南的大理政权，还远征到中亚、西亚、东欧地区。

1260年，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即位，开始推行中原传统政治制度，兴建大都。1271年，忽必烈定国号为大元，他就是元世祖。在此前后，蒙古在其他统治区形成了四大汗国，它们在名义上仍将元朝尊为宗主国。1276年，元军占领南宋都城临安。1279年，元军在崖山海域击败南宋余部，完成统一。南宋宰相文天祥被俘，坚拒劝降，后来在大都从容就义。

为巩固统一，元朝修筑了四通八达的驿道，设立驿站，为公差人员提供交通和生活服务，并运输官府物资；相隔一定距离分设急递铺，负责传递公文。

在地方管理上，元朝实行行省制度。当时中央的宰相机构是中书省，委派官员代表中书省处理地方事务，逐渐形成常设机构，称为行中书省，简称行省。除今天的河北、山西、山东地区由中书省直辖外，全国共设10个行省。行省辖区广阔，军政大权集中，提高了行政效率，巩固了多民族国家统一，也促进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它的创立是中国古代地方行政制度的重大变革，是我国省制的开端。对于吐蕃地区，由直属中央政府的宣政院进行管理。元朝设北庭都元帅府、宣慰司等管理军政事务，加强了对西域的管辖。元朝还在隶属福建晋江的澎湖设置巡检司，履行行政管理职能，以经略台湾。

四、元朝的民族关系

蒙古原是漠北的一个游牧部落，铁木真统一草原后逐渐将其他部落融入其中。元朝时，很多蒙古人迁入中原，同汉族杂居相处。来自中亚、西亚的波斯人、阿拉伯人等移居中国，同汉、蒙古、畏兀儿等民族长期相处、不断通婚，逐渐被吸收、融合而形成我国回族的前身——回回。

蒙古统治者为了保障自己的统治利益，推行民族歧视和压迫政策。他们在很多方面对不同民族采取差别对待措施，被后人概括为“四等人制”。四等人依次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色目人指蒙古以外的西北、西域各族人，包括西夏、畏兀儿、回回等。汉人主要指北方的汉族，也包括已经入居中原的契丹、女真人。南人指原南宋统治区的居民。

随着时间推移，民族矛盾逐渐减弱，社会贫富差距带来的阶级矛盾却日益严重。14世纪中叶，农民起义相继在中原和南方爆发，不久元朝灭亡，以宫廷贵族为核心的一部分蒙古人退回草原。大批留居内地的蒙古人、色目人等，逐渐与汉族相融合。

第11课 辽宋夏金元的经济、社会与文化

一、经济的发展

宋朝农业发展成就突出。一年两熟的稻麦复种制在南方已经相当普及，有些地方还可以一年三熟，提高了粮食产量。一些地区出现了固定种植某种经济作物的农户，对传统自然经济结构有一定突破。棉花在内地的种植始于宋朝，在元朝得到大力推广，南方植棉逐渐普遍，带动了棉纺织业的发展。

宋朝制瓷技术有重要改进，出现了以定窑、汝窑、哥窑、官窑、钧窑等五大名窑为代表、风格各异的瓷器，色彩多变，质感浑厚。元朝烧出了新型彩绘瓷器青花瓷和釉里红。宋元时期，瓷器大量出口海外，成为继丝绸之后中华文明新的物质象征。矿冶业在北宋手工业中占有重要地位。煤的开采量很大，都城东京的居民普遍使用煤作燃料。燃料的改进大大提高了金属冶炼的产量和质量。印刷业在宋元时期发展迅速，进一步带动了造纸业的发展。

在辽夏金元统治之下，边疆地区获得进一步开发，漠北、东北、西北、西南的农业和手工业都有显著进步。

商品经济在宋朝发展到一个高峰，面向大众的基层市场蓬勃涌现。宋与辽夏金各政权之间的经济往来十分密切，官方设置榷场进行互市交易，民间贸易也相当活跃。商品流通规模的扩大，使得货币需求量剧增。北宋钱币年铸造量最多时高出唐朝十多倍，开始出现纸币——交子。元朝在全国范围内将纸币作为主币发行，加上大一统带来的稳定局面和交通系统的发展，推动了商业的发展。城市的兴盛引人注目，北宋东京、南宋临安、元朝的大都和杭州尤以繁华著称。

宋元时期，海外贸易非常繁荣。外贸税收成为宋元两朝国库的重要财源。大型远洋海船装载丝织品、瓷器等，远销亚非许多国家和地区，输入中国的商品以香料、珠宝等为主。主要外贸港口有广州、泉州、明州等。

自唐朝中期以来，南方的经济实力增长迅速。北宋在经济上对南方依赖明显，户口分布南多北少的格局也已定型。长江下游和太湖流域一带，成为全国最重要的粮仓，谚语称“苏湖熟，天下足”。元朝的南北经济差距继续扩大，全国大部分人口和税收集中在江南。为将南方财赋顺利北运，元朝对隋唐时期的大运河进行取直，大大缩短了航程。元朝还创造性地开辟了长途海运航线，主要任务也是运输江南的粮食。

二、社会的变化

隋唐时期，士族阶层在政治上已经衰落，但重视家族背景的门第观念仍然十分流行。到宋朝，这种情况发生了根本改变。当时科举制度比唐朝更为完善，不仅原则上面向全社会开放，而且更加强调公平竞争。大批出身平民家庭的士人进入政坛，不少人官居高位，给政治增添了活力。人们的婚姻择偶，也以当下政治、经济地位为重，不再关心祖先名望。时人将这些变化概括为“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

宋以前，社会上长期存在人身不完全自由并且受到歧视的贱民阶层。到宋朝，他们的数量显著减少。前代的家内服役大都由世袭奴婢承担，宋朝更多地来自雇佣。宋朝无地农民通常与地主签订契约，租种土地，也较少受到契约关系以外的人身束缚。

为适应社会经济的变化，宋朝政府适当放松了对社会的控制。土地买卖、典当基本不受官府干预，仅办理法律手续，缴纳交易税即可。“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成为普遍现象。对于百姓迁移住所、更换职业，以及日常生活标准，官府的限制也比前代更为松弛。

三、儒学的复兴

从三国到五代，以阐释经书字句为主的儒家学说日益僵化，社会影响总体来说不及佛教和道教。从北宋中期起，一批学者掀起了儒学复兴运动。他们力图挖掘儒家经书的思想内涵，强调学术为现实服务，特别是希望充分发挥儒学在强化社会伦理道德秩序、树立基本价值观方面的作用，提出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口号。其中，被称为理学的学派影响逐渐增大，其代表人物是北宋的程颢、程颐兄弟和南宋的朱熹，因此这一学派也被称为“程朱理学”。

理学认为“理”是自然界和社会的根本原则，也称“天理”，主张“存天理，灭人欲”，即通过道德修养克服过度的欲望。理学还提出“格物致知”，认为只有深刻探究万物，才能真正得到其中的“理”，逐渐达到对普遍天理的认识。

从南宋后期起，程朱理学受到官方尊崇，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四、文学艺术和科技

唐朝后期出现的一种新诗体——词，到宋朝进入鼎盛时期。词的句子长短不等，用来配乐歌唱，根据乐谱分为不同的词牌，各有固定格式。两宋城市生活丰富多彩，娱乐场所需要大量的歌词。士大夫的著名词作在社会上广泛流传，以豪放派的苏轼、辛弃疾和婉约派的柳永、李清照的词作成就最为突出。

元朝文学的主要成就是曲，包括散曲和杂剧。散曲是一种比词更灵活、更通俗的长短句配乐诗歌体裁，更加适合市井演唱的需要。演员将成套的散曲连缀在一起歌唱，辅以音乐、舞蹈、表演、道白，安排不同的角色，来表达一个完整的故事情节，形成了杂剧。元杂剧标志着中国古代戏曲艺术的成熟，代表作家有关汉卿、王实甫等。

宋元时期，城市中说书演出非常盛行。说书底本称为话本，实际上就是早期的白话小说。

宋元两朝，书法名家辈出，与唐朝相比更加追求个性，不拘法度。绘画成就以山水画最为突出，不强调写实，注重意境和笔墨情趣。花鸟画、人物画水平也很高。

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三大发明在宋朝基本成熟。雕版印刷已经相当普及，北宋工匠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火药被大量制造并用于军事。用人工磁化的方法造出的指南针，广泛应用于航海。三大发明为人类文明的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

北宋的沈括和元朝的郭守敬是两位大科学家，在科技领域取得了多方面成就。沈括所著《梦溪笔谈》记载和总结了当时的许多科技成果。郭守敬最突出的成就是设计和监制多种天文观测仪器，主持全国范围的天文测量，编定新的历法《授时历》，其中测定的数据在当时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元朝农学家王祯编撰的《农书》，集北方和南方的农业技术于一体，其中关于农业工具的记载尤为丰富。

第四单元 明清中国版图的奠定与面临的挑战

明清是中国古代最后两个王朝。本单元所说清朝仅指 1840 年鸦片战争以前的时期。在明清两朝，专制集权空前强化，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更趋稳固，现代中国的版图逐渐定型，经济、文化、对外关系都有新的发展。这一时期，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新航路开辟后，世界逐渐连为一体，欧洲走出了中世纪，开始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新兴工业文明取代传统农业文明，已成为世界大势所趋。而在中国，由于传统经济结构和专制体制的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日益受到阻碍。统治者故步自封，拒绝扩大对外交往，进一步扼杀了中国跟上世界潮流的机会，埋下了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伏笔。

通过本单元的学习，了解明清时期统一全国和经略边疆的相关举措，认识这一时期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版图奠定的重要意义；了解明清时期社会经济、思想文化的重要变化；认识明清时期封建专制发展和世界形势变化对中国的影响，以及中国社会面临的危机。

第 12 课 从明朝建立到清军入关

一、明朝政治制度的变化

1351 年，元朝爆发农民起义，起义迅速波及全国大部分地区。起义将领朱元璋势力逐渐强大，统一了南方大部分地区。1368 年，朱元璋称帝，定都应天府，国号大明。朱元璋就是明太祖。同年，明军攻占大都，结束了元朝在全国的统治。

明太祖为加强皇权，废除了自秦以来一直实行的宰相制度，并且严令子孙永远不许设立宰相。这一举措对以后五百余年的政治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

废除宰相后，皇帝需要直接领导六部等具体职能部门，工作压力成倍增加。明太祖的儿子明成祖在位时，选拔一些文官到皇宫内的文渊阁值班，充当秘书。从此，一个常设的辅佐皇帝处理政务的秘书机构形成，称“内阁”，其官员称为某殿或某阁大学士。大学士的日常工作主要是替皇帝浏览百官奏章，草拟处理意见，称为“票拟”。皇帝在票拟的基础上，用红笔正式批复奏章，称为“批红”。明朝中后期，有的大学士深得皇帝信任，权力很大，被比喻为宰相。

比较而言，宦官比内阁更多地得到皇帝信任，以致出现宦官专权的局面。内廷宦官机构司礼监获得了协助甚至代理皇帝批红的权力，还负责提督东厂，控制锦衣卫，对官民的言行进行监视、侦查，有权限捕、施刑。

二、海上交通与沿海形势

15 世纪前期，明成祖派遣宦官郑和远航海外。郑和先后七次率领船队出海，访问了亚非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和红海沿岸，史称“郑和下西洋”。郑和下西洋是世界历史上规模空前的远洋航行，在资金、装备、技术等方面大大领先于半个多世纪之后的欧洲远洋航海家的航行。但是，其目的主要是“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给明朝带来较大的财政负担，因此后来未能持续。

从元朝末年起，日本海盗不时在我国东部沿海骚扰，被称为“倭寇”。明朝前期，朝廷出于对日本实行经济封锁的目的，严厉禁止海外贸易。东南沿海地区的一些海盗、奸商等与倭寇勾结，进行走私活动，出没沿海，烧杀抢掠，造成巨大破坏。明廷派遣大将戚继光等人

平倭。在抗倭斗争中，戚继光率领戚家军，在浙江台州九战九捷；在福建、广东与抗倭将领俞大猷合作，连续重创倭寇，东南沿海形势稳定下来，朝廷遂放松了对私人海外贸易的限制。民族英雄戚继光的抗倭事迹被后世所传颂。

明朝中后期，随着新航路的开辟，欧洲殖民者在中国沿海的活动日益频繁。16世纪中期，葡萄牙人以晾晒货物为由，贿赂香山县地方官获得了在濠镜澳的租住权。稍晚东来的荷兰和西班牙，分别占据了台湾岛的南部和北部。明朝末年，西班牙被荷兰击败，退出台湾。

三、内陆边疆与明清易代

元朝灭亡后，草原上的蒙古人逐渐形成鞑靼、瓦刺两大集团。为防御他们南下，明朝重新修筑了长城。明中期，瓦刺和鞑靼不断威胁明朝北部边防，两次突破长城深入内地，包围北京。瓦刺还曾经在一次战役中俘虏了明英宗。1571年，鞑靼首领俺答汗与明朝订立和议，接受明朝册封。双方恢复并扩大贸易关系，直到明末基本上维持了和平局面。

藏族地区在明朝时称为乌思藏。明廷封授给当地的僧俗首领法王、王等称号，并设立了行都指挥使司等机构管理西藏军民事务，任用藏族上层人士进行管理。

明朝前期，派人到东北招抚，在黑龙江流域设立了奴儿干都司，并对东北女真各部落首领封授官号。16、17世纪之交，女真建州部首领努尔哈赤逐渐统一女真各部，1616年称汗，国号大金，并对明朝展开进攻。其子皇太极在位时，将女真族名改为满洲，并于1636年称帝，改国号为大清。后来，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分别被尊为清太祖和清太宗。

在清朝崛起之际，明朝政治黑暗，天灾不断，农民起义蜂起，统治摇摇欲坠。1644年，农民军首领李自成在西安建立大顺政权，随即攻占北京，明思宗自缢，明朝灭亡。清朝摄政王多尔衮统军进入山海关，打败李自成，进占并迁都北京。此后又经过20多年的激烈战斗，清朝将农民军余部和南方的明朝残余势力逐一击败，确立了在全国的统治。

第13课 清朝前中期的鼎盛与危机

一、康雍乾时期的君主专制

清朝皇帝康熙、雍正、乾隆在位期间，出现了100多年的鼎盛局面，政局稳定，经济繁荣，疆域开拓并巩固，被称为“康乾盛世”。

三位皇帝都以勤政著称。他们独断朝廷大政方针，对地方具体事务，也总是不厌其烦地详加过问，君主专制得到加强。

这一时期，部分官员向皇帝单独呈送密封报告，皇帝亲手批阅后返回，不经过其他中转、收发环节，形成了奏折制度。这种迅速、机密的联系方式，使皇帝能够更直接、广泛地获取信息，提高了决策效率，强化了对官僚机构的控制。

中枢秘书机构也发生了变化。雍正时，在皇帝寝宫旁边设立军机处，军机大臣由被指派的朝臣兼职充任。军机处官员在皇帝直接监督下工作，日夜轮流值班，商议军情，起草或处理机要文书。内阁只负责处理一般文书。

清朝统治者对思想文化的控制非常严密，频繁制造文字狱，对文化造成严重的摧残。

二、疆域的奠定

康乾盛世时期，清朝版图在前代王朝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开拓和巩固。

1662年，郑成功驱逐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1683年，清军渡海远征，郑氏后裔战败投降。第二年，清朝在台湾设府，隶属福建省。

17世纪中叶，沙皇俄国的势力侵入我国黑龙江流域。康熙前期，清军围攻侵占雅克萨的俄军，迫使沙俄同意进行谈判。1689年，两国签订《尼布楚条约》，从法律上确定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包括库页岛在内的广大地区都是中国领土。

明朝末年，鞑靼分为漠南蒙古和漠北蒙古，瓦刺被称为漠西蒙古。清军入关前，打败并收降漠南蒙古，漠北和漠西蒙古也遣使进贡。17世纪后期，漠西蒙古准噶尔部的首领噶尔丹势力强大，占据天山南北，又向东进攻漠北和漠南蒙古。清军与噶尔丹及其后继者进行了长期斗争，最终在1757年将准噶尔部彻底击败。原受准噶尔部统治的天山南路维吾尔贵族大、小和卓兄弟起兵反清，很快也被平定。清朝在蒙古族地区设立盟、旗两级单位进行统治，任命蒙古王公为盟长、旗长。1762年，清朝在新疆设立伊犁将军，总领军政事务。

清初，西藏最有影响的佛教格鲁派领袖五世达赖来京朝贺，清政府册封以“达赖喇嘛”尊号。另一位格鲁派领袖五世班禅，在康熙时被赐予“班禅额尔德尼”尊号。此后历世达赖和班禅，都经由中央政府册封。从1727年起，清朝开始派遣驻藏大臣，代表朝廷与达赖、班禅共同治理西藏。1793年，清政府颁布《钦定藏内善后章程》29条，以法律形式明确和落实了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管辖权。

清朝专设理藩院掌管蒙古族、藏族等民族事务。清政府对边疆地区采取因地制宜的政策，尊重各民族的社会习俗和宗教信仰，优待各族上层分子，保证了局势的稳定。

清朝中期，疆域西跨葱岭，西北达巴勒喀什池，北接西伯利亚，东北至外兴安岭和库页岛，东临太平洋，东南到台湾及其附属岛屿，包括钓鱼岛、赤尾屿等，南至南海诸岛，西南抵喜马拉雅山脉。在清朝疆域里，内地分立18省，分设巡抚、总督治理。在东北、北部和西部边疆，分设若干将军辖区和办事大臣辖区。

三、统治危机的初显

康乾盛世后期，清朝统治已出现由盛转衰的迹象。19世纪前期，嘉庆、道光两位皇帝在位时，衰象更为明显。

在经济繁荣、国土开发的背景下，清朝人口膨胀迅速。1741年，统计全国人口达到1.4亿，到1840年已增至4.1亿。人口急剧增长使得资源危机日益显露，加上政治腐败和贫富矛盾的积累，乱象逐渐萌生。从乾隆后期起，农民起义屡屡爆发，大部分是由民间秘密宗教白莲教领导的。四川、湖北、陕西等省爆发的白莲教大起义持续了十年。嘉庆后期，白莲教支派天理教发动的一次起义还攻入了北京皇宫。

这一时期，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在中国东南沿海频繁活动，要求扩大对华贸易，开拓中国市场。清朝起初指定四处对外通商口岸，后仅保留广州一处，并规定由官府特许的“十三行”商人代为管理对外贸易事务。外商在广州的活动及其与中国商民的交往，都受到严格约束。民间船只出海贸易，更在严厉禁止之列。这种闭关自守的政策，无法适应新的外部环境，中国逐渐落后于世界潮流。

第14课 明至清中叶的经济与文化

一、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局限

随着新航路的开辟，明朝后期，一些新的农作物品种输入中国。其中高产粮食作物玉米、甘薯的推广种植，大幅度提高了粮食总产量。江南等地区农业的多种经营日益兴盛，经济作物品种繁多，种植广泛，很多农民还兼营产品初级加工或相关副业，以获取更多的收入。

手工业各行业都有不同程度的进步。明朝后期，在南方一些地区的丝织、榨油、制瓷等行业中出现了新的经营方式，即开设工场，使用自由雇佣劳动进行较大规模的生产。这类情况在清朝继续有所发展。

自明朝后期起，商品经济进入新的繁荣期。美洲等地的白银通过海外贸易大量流入，促进了长途和大额贸易的发展，也有利于商业资本的集聚。一些地方的人以经商闻名，形成实力雄厚的商人群体，如安徽南部的徽商和山西的晋商。在工商业发达地区和交通要冲，兴起一大批以经济功能为主的工商业市镇，商业活跃，人口密集，成为地区贸易网络的核心。

然而就全社会来看，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传统小农经济还占据压倒优势。日益僵化的专制统治，也压制和阻碍着社会的进步和转型。

二、思想领域的变化

程朱理学获得官方尊崇后，逐渐失去活力。明朝中期，王守仁在南宋陆九渊思想基础上，提出一套以“致良知”为核心的理论，形成陆王心学。“良知”就是隐藏在每个人心中的“天理”，往往被私欲遮蔽，需要重新发现、扩充和践行，这样就可以达到圣贤境界。陆王心学强调主观能动性，激励人们奋发立志；而以自己的内心为准则，又隐含一定的平等和叛逆色彩。陆王心学带有主观唯心主义倾向。在此基础上，明朝后期以李贽为代表的一些思想家提倡个性自由，蔑视权威和教条，甚至否定传统伦理道德标准，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震动。

明末清初社会的剧烈动荡，促进了思想界的活跃。思想家黄宗羲严厉抨击君主专制制度，称专制帝王为“天下之大害”。他还反对重农抑商观念，提出“工商皆本”。顾炎武、王夫之也对高度集权的政治制度进行了批判。他们还有一些重要的见解，如顾炎武认为“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后人概括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三、小说与戏曲

在城市商品经济繁荣、社会娱乐活动丰富、文化知识进一步普及的背景下，明清的小说和戏曲取得了重要成就。

元末明初，施耐庵、罗贯中在宋元话本基础上创作的《水浒传》和《三国志通俗演义》，是我国最早的两部长篇白话小说，开创了章回体的写作体裁。明朝中期吴承恩的《西游记》和清朝中期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分别是神话小说和讽刺小说的杰作。清朝中期曹雪芹的长篇小说《红楼梦》，以贵族家庭贾府的兴衰变迁为主线，生动地再现了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多个侧面，是我国古典现实主义文学的高峰，也是享誉世界的名著。

明清戏曲创作也趋向长篇化，情节更加曲折复杂，称为传奇，代表作家有明朝汤显祖、清朝孔尚任等。舞台演出方面，从江苏昆山一带发源的昆曲长期流行。清朝道光年间，以徽班为基础，融合徽、汉二调，吸取昆曲和其他地方戏的艺术成分，形成了京剧，并且逐渐成为全国最流行的剧种。

四、科技

明朝后期，几部重要科技著作相继问世。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和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分别系统记载了中国古代医药学、农学、工艺学的相关知识，在各自领域对传统科学技术进行了总结。徐弘祖的《徐霞客游记》是一部地理和地质学名著。

从明朝后期起，一些欧洲天主教传教士前来中国传教，代表人物有意大利人利玛窦等。他们借助传播科学知识来达到传教的目的，与一些开明的中国士大夫合作翻译西方科学书籍，在一定范围内传播了西方科技知识。清朝前期，传教士还运用欧洲测绘技术，帮助清廷绘制了较为精确的全国地图。

第五单元 晚清时期的内忧外患与救亡图存

鸦片战争后的数十年间，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国家陷入内忧外患的严重局面，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历史进入饱经磨难的近代时期。边疆不断出现危机，中国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洪秀全发动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试图推翻清朝，建立“地上天国”。继而，清政府推行洋务新政，试图解决国弱民贫问题。这些都未能挽救国家落后挨打的局面。甲午中日战争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日益加深，中国的民族危机不断加剧，维新派掀起了一场旨在救亡图存的戊戌变法运动。1900年，义和团运动高涨，八国联军趁机侵略中国。清政府被迫与侵略者签订了《辛丑条约》，中国的民族危机全面加深。

通过本单元的学习，认识列强侵华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了解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事迹，理解其性质和意义；认识社会各阶级为挽救危局所作的努力及存在的局限性。

第15课 两次鸦片战争

一、19世纪中期的世界与中国

工业革命后半个多世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英、法、美等国逐渐占据主导地位。英国社会生产力飞速增长，对市场和原料的需求越来越强烈。各国争夺殖民地的斗争日趋激烈。当时，英国掌握着资本主义世界的霸权。英国在美洲、非洲夺取殖民地的同时，把目标瞄准了亚洲。法国从越南打开侵入亚洲的缺口。19世纪40年代，俄国势力侵入中国东北和新疆地区，美国也积极参与到侵华活动中。世界主要殖民主义国家都把矛头指向了中国。欧洲资本主义不断发展，而清政府对世界形势的变化浑然不觉，中国仍然停留在封建社会，君主专制统治依旧顽固。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主要的生产方式，科技落后。八旗和绿营作战能力低下，使用的武器主要是冷兵器，远远落后于英国的热兵器。社会阶级矛盾激化，各地农民起义此起彼伏。

二、两次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前，外国鸦片商人逐年扩大对华鸦片走私，使中国一年流失的白银超过1000万两。鸦片烟毒损害了中国人的健康，加剧了政治腐败，削弱了军队战斗力，加重了劳动人民负担。面对广州外海的鸦片走私，道光皇帝特命湖广总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往广州禁烟。林则徐将英美鸦片商人呈缴的走私鸦片烟土两万多箱，在虎门海滩公开销毁，向世界表明了清政府禁烟的决心。英国大鸦片贩子认为中国禁烟措施损害了英国的利益，英国政府宣布对华发动战争。

1840年6月，英国远征军总司令懿律率军舰40余艘，士兵4000多名，开进广州海口，发动侵略战争。清政府组织了抵抗。这场反击英国侵略的战争，以1842年8月29日清政府被迫签订中英《南京条约》而结束。《南京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国被迫割让香港岛、赔款2100万银元、接受协定关税以及开放五口通商等。1843年，清政府又与英国签订《虎门条约》。1844年，美国、法国分别迫使清政府签订《望厦条约》《黄埔条约》。通过这些条约，英、美、法三国从中国获得了协定关税、领事裁判权、

片面最惠国待遇以及通商口岸传教权等。《南京条约》等一批不平等条约的签订，长期影响了近代中国历史的进程，鸦片战争由此成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英国等侵略者从鸦片战争中获得了种种特权，但是未能达到鸦片贸易合法化的目的。为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它们要求修约，被清政府拒绝。1856年，英、法两国对中国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美、俄两国以调停人面目出现。1858年，清政府被迫分别与英、法、美、俄四国签订《天津条约》。次年，英、法拒绝按照清政府指定路线进京换约，进攻大沽炮台，遭到清军反击，英法兵舰损失很大。大沽战后，为了报复中国，英法联军军舰百余艘、陆军近三万人，于1860年8月占领天津。10月，英法联军抢劫、焚毁圆明园后，进入北京城，迫使清政府签订《北京条约》。通过《天津条约》《北京条约》，英、法获取了割地、赔款、开放通商口岸以及内河航行权等大量权益。鸦片以“洋药”名义纳税进口，实现了鸦片贸易合法化。俄国借机迫使清政府签订《北京条约》，并承认此前签订的《瑷珲条约》，抢占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100余万平方千米的中国土地，还把俄方提出的边界走向强加给中国，为此后大规模侵占中国领土制造根据。从《南京条约》到《北京条约》，外国侵略者把不平等条约体系强加在中国身上，中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受到了严重侵犯，中国从一个独立的封建社会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三、开眼看世界

《南京条约》签订后，道光皇帝仍不知道英国位于何方，充分反映了清朝统治阶级高层的封闭、愚昧与腐朽。林则徐、魏源是近代中国最早开眼看世界的人。林则徐面对英美官员交涉鸦片烟土需要国际知识，便在广州开办译馆，罗致译员，收集有关西洋各国的消息情报和国际知识，包括国际法知识，汇译成《四洲志》等书稿，供对外交涉时参考。林则徐被贬后，把《四洲志》交给他的朋友魏源。魏源注意收集外国史地知识，在《四洲志》基础上编成《海国图志》一书。这部书按照世界五大洲介绍各国历史、地理、社会现状以及军事、科技等，是近代中国最早介绍外国历史地理的书籍之一，被誉为了解外国知识的“百科全书”。魏源在书中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

福建布政使徐继畲是又一位开眼看世界的人。他在福建处理对外交涉事务，留心搜集外国事物和西人著述，撰成《瀛寰志略》一书。《瀛寰志略》系统介绍了当时世界上近80个国家和地区的地理位置、历史变迁、经济文化、风土人情，内容丰富，叙述完备，尤重对欧美各国的考察和介绍，是中国近代第一部世界地理著作。这些开眼看世界的仁人志士，初步提出了向西方学习以求自强的主张。

第16课 国家出路的探索与列强侵略的加剧

一、太平天国运动

广东花县人洪秀全在多次科举考试落第后极端失望，吸收了在广州得到的基督教布道书的一些思想，提出了“拜上帝”的主张。他的同乡冯云山到广西紫荆山号召民众加入拜上帝会，团结了许多穷苦农民。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杨秀清等在广西桂平金田村发动起义，建号太平天国。不久，洪秀全称天王。太平军一路北上，出广西，经湖南，占领湖北省

城武昌。1853年，太平军沿长江东下，经九江、安庆，占领南京，改南京为天京，定都于此。然后，太平军北伐、西征，占领湖北、江西、安徽的许多地方，军事上达到鼎盛，但领导集团日渐腐败。1856年，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发生内讧，杨秀清、韦昌辉被杀，石达开出走，太平天国在政治、军事上开始衰落。之后，洪仁玕、陈玉成、李秀成进入最高领导层，太平军先后取得浦口、三河大捷，但在安庆战役中败于曾国藩统率的湘军。1864年，在湘军、淮军和外国人带领的洋枪队进攻下，太平军节节败退，天京等地被攻破，太平天国运动失败。

太平天国前期曾颁布《天朝田亩制度》，提出了“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的主张，否定了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反映了农民追求社会财富平均的理想；后期曾颁布《资政新篇》，提出了新的社会经济政策，试图回答农民革命应当向何处去的问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两个文件都未能实施。由于农民阶级的历史局限性，缺乏科学思想理论的指导，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不可能冲破封建社会的制度和思想，失败是必然的。

太平天国运动虽然失败，但它沉重打击了清王朝的统治，引起政治和权力结构的变化。随着湘淮系官僚集团的崛起，中央权力下移，对此后历史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二、洋务运动

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统治阶级中的一些当权人物看到了欧美国家的船坚炮利。为了挽救国家的颓势，他们推行了一系列以“自强”“求富”为目标的洋务新政。学术界把这种推行新政的系列举措称为“洋务运动”，把提倡洋务新政的官僚称为“洋务派”。洋务派人物主要有奕诉、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他们认为开办洋务新政，购置船炮器械，“可以剿发逆，可以勤远略”。

为了自强，洋务派创办了一批官办的军事工业，如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等。为了求富，洋务派又开办了一批官督商办的民用企业，如上海轮船招商局、上海机器织布局、开平煤矿等。洋务派还办了培养翻译和军事人才的学校，建成了以北洋舰队为代表的新式海军。洋务新政引进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机器生产技术，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尝试。洋务派期望洋务新政可以保障国家安全，抵抗外敌侵略，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目的未能达到。洋务派的初衷不是改变封建统治，只是引进资本主义国家新的军事和生产技术，是在封建制度的基础上修修补补，洋务运动的失败是必然的。

三、边疆危机与甲午中日战争

19世纪60年代以后，中国西北、西南、东南边疆地区安全遇到了严重危机。俄国、英国、日本、法国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

1864年，新疆地区少数民族上层分子反对清政府，形成内乱局面。英国支持的浩罕国军事首领阿古柏趁机入侵，占领南疆和北疆部分地区。俄国出兵占领伊犁地区。1875年，清政府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发兵新疆，1878年2月收复新疆南北两路。后来，清政府与俄国交涉，收回伊犁大部分地区。1884年，清政府在新疆地区正式建省，使西北边疆渡过了危机。越南是清朝的藩属国。1883年8月，法国控制了越南，把侵略矛头对准了中国，中法战争于年底打响。1884年8月，法军偷袭马尾军港，炮毁福州造船厂。同年，法军进攻台湾，当地军民在督办台湾军务大臣刘铭传领导下，严密布防，多次击退法军。1885年3月，清军在冯子材率领下取得镇南关大捷，法军败退，法国内阁因此倒台。

这时，清廷下达停战令。6月，李鸿章与法国驻华公使签订了中法《越南条款》，承认法国占领越南。1885年台湾建省，清政府强化了对台湾的管辖。

日本早就想占领中国的台湾和藩属国朝鲜、琉球，然后进攻中国大陆。因朝鲜发生农民起义，朝鲜国王请求清政府出兵。通过明治维新壮大了国力的日本，趁机出兵朝鲜，且在牙山口外丰岛偷袭清朝运兵船。1894年8月，甲午中日战争正式开始。9月，清军在平壤大败。同月，在黄海海战中，北洋舰队官兵英勇作战，重创日本舰队，致远舰管带邓世昌、经远舰管带林永升率部英勇奋战，最终与舰同沉。此次海战中，北洋舰队遭到重大损失。战后，李鸿章发出“避战保船”命令，北洋海军失去了制海权。随后，日军入侵辽东半岛，在占领旅顺后，进行了长达4天的大屠杀，杀害2万多中国人。1895年2月，日军在山东半岛登陆后，摧毁了北洋舰队基地威海卫军港，北洋舰队覆灭。清政府派李鸿章到日本马关与日本政府议和，被迫签订《马关条约》，承认朝鲜“独立”，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给日本，赔款2亿两白银，增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日本可以在中国通商口岸设厂制造。《马关条约》丧权辱国，进一步把中国社会推向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证明了洋务运动的破产。

日本侵占台湾后，台湾人民进行了顽强抗争。1895年5至10月，台湾义勇军与以刘永福为首的留台清军一起，展开了一波又一波反抗日军占领的武装斗争，重挫了日本占领军。台湾人民的武装抗日斗争，表明了台湾人民不屈服于日本的坚强意志。

四、瓜分中国的狂潮

《马关条约》签订后，俄、德、法“三国干涉还辽”。日本被迫归还辽东半岛，但向清政府索取3000万两白银“赎辽费”。为了在三年内向日本交出2.3亿两白银，清政府分三次向俄法银行团、英德银行团以高额利息借款3亿两白银。各帝国主义国家纷纷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在从渤海到南海的中国沿海地区强租租借地：俄国租旅大，英国租威海卫，德国租胶州湾，英国租九龙，法国租广州湾。列强还在中国大量掠夺铁路和工矿利权。

第17课 挽救民族危亡的斗争

一、戊戌维新运动

日本逼迫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回国内，激起朝野上下的反对声浪。在京官员及在京参加会试的各省举人纷纷联名上书。康有为、梁启超组织了联合各省举人的“公车上书”，虽未送达光绪皇帝，但拉开了维新运动的序幕。

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在维新派推动下，颁布“明定国是”诏书。此后的103天里，光绪皇帝先后发布上百道变法诏令，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除旧布新的举措，史称“百日维新”。清政府中的守旧势力以种种理由阻止变法的开展。9月21日，慈禧太后将光绪皇帝囚禁，再次临朝训政。康有为、梁启超被迫逃亡海外，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杨深秀、康广仁六人，被杀于北京菜市口，史称“戊戌六君子”。变法期间的改革措施，除京师大学堂得以保留外，均被废止。戊戌维新运动对于推动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新思想的传播，起到了积极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旧式官僚体制。由于

守旧势力仍很强大，而维新派缺乏可靠的社会基础，没有严密的组织，又把希望寄托于并未完全掌握实权的皇帝身上，导致这场运动未能实现预期的目标，以失败告终。

二、义和团运动

《马关条约》签订后，西方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民族危机日益加剧。义和团运动是在反洋教的斗争中兴起的。西方势力深入中国城市、乡村后引发了一系列冲突，特别是德国强占胶州湾，进一步刺激了山东民众。以“扶清灭洋”为口号的反洋教斗争蔓延到山东、直隶很多州县农村。先后担任山东巡抚的毓贤、袁世凯等，对义和团采取先抚后剿的举措。各国公使要求清政府取缔义和团。1900年5月28日，英、美、法、德、俄、日、奥匈、意八国决定联合出兵镇压义和团。慈禧太后采用“招抚”义和团的办法，企图对义和团加以控制利用。后来，在中外势力联合镇压下，义和团运动失败。义和团运动具有强烈的反帝爱国倾向，也存在明显的盲目排外行为。由于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义和团运动无法阻止中国滑向半殖民地的深渊，但它所展现的中国人民不畏强暴的牺牲精神，使外国列强认识到，任何国家“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瓜分一事，实为下策”。

三、八国联军侵华

1900年6月10日，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率领第一批联军从天津乘火车向北京进发，在廊坊附近遭到义和团和清军的顽强阻击，被迫退回天津。6月中旬，八国联军攻陷大沽炮台，向天津进犯，义和团和清军奋起投入天津保卫战。6月21日，慈禧太后作出向各国“宣战”的决定。7月14日，天津陷落。8月中旬，北京失陷，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仓皇出逃，后到西安。逃亡途中，慈禧太后发布铲除义和团的谕旨，并指定庆亲王奕劻和李鸿章为全权代表与列强议和。

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继续派兵侵略其他地方，在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犯下骇人听闻的罪行。俄国军队趁机侵占中国东北。当时，南方各省督抚与英、美等国洽商“东南互保”协议，严重动摇了清政府统治的根基。

四、民族危机的加深

1900年12月，列强向清政府提出《议和大纲》，后又订立详细条款。由于各国利益不同，谈判旷日持久。1901年9月7日，清政府被迫与组成联军的8国及西班牙、荷兰、比利时3国共11国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列强通过《辛丑条约》对华制裁，共计12款，还有19个附件。主要内容有：惩办“首祸诸臣”，涉及中央和地方大臣百余人；向各国赔款白银4.5亿两，分39年还清，年息4厘，本息共计白银约9.82亿两；将北京东交民巷划定为使馆区，中国人不得居住，各国可派兵驻守；拆除大沽及有碍北京至海通道的所有炮台，各国可在自北京至山海关沿铁路12个重要地区驻扎军队；禁止华北等地科举考试5年，禁止中国人成立或加入任何“与诸国仇敌之会”；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等。

《辛丑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主权丧失最严重、赔款数目最庞大的不平等条约。巨额赔款，加剧了中国的贫困和经济的衰败；外国军队驻扎于中国战略要地，严重破坏了中国的主权完整；在北京设立的“使馆界”，实际成为“国中之国”。《辛丑条约》的订立，标志着中国完全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第六单元 辛亥革命与中华民国的建立

随着清政府统治危机的加深，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在全国迅速广泛地开展起来。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各省纷纷响应。这场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君主专制，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颁布了一系列有关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的法令。其中，以《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最为重要。袁世凯夺取革命果实后，逐步建立起北洋军阀的独裁统治。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为反对袁世凯的倒行逆施进行了不懈斗争。这一时期，特殊的内外环境使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得到短暂发展机会。1915年，以陈独秀等为代表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发动了反封建、倡导民主与科学的新文化运动。通过本单元的学习，了解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基本内容，理解辛亥革命对中国结束帝制、建立民国的意义及历史局限性；了解北洋军阀的统治及特点；了解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理解其对近代中国思想解放的影响。

第18课 辛亥革命

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兴起

1901年初，遭受重挫的清政府也试图通过“新政”进行“自救”，在官制、军事、商业、教育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新政”的内容与戊戌维新时期所颁布的改革举措颇多相似，但更为广泛深入。由于政权掌握在极端腐败无能的权贵手中，清政府不可能为中国找到真正的出路。这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只有推翻这个政府，中国才有希望。

孙中山首先举起了反清革命的旗帜。孙中山是广东省香山县人，出身农民家庭，先后在檀香山、广州、香港等地比较系统地接受了西式的近代教育。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后，孙中山深知改良道路不能挽救国家，于1894年11月在檀香山组织兴中会，走上了革命道路。1905年8月20日，孙中山与黄兴等人在日本东京创建全国性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孙中山被推举为总理。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成为中国同盟会纲领。在中国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首次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合称“三民主义”。中国同盟会的成立，有力促进了革命运动的发展。除继续宣传革命的理论和主张外，孙中山还组织了多次反清武装起义。以徐锡麟、秋瑾等为代表的一大批革命党人前仆后继，给清政府以沉重打击。1911年4月27日的广州黄花岗起义引起了巨大震动。

在革命运动高涨之际，1906年9月，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立宪派成立了预备立宪公会，积极推进立宪运动。1908年8月，清政府颁布《钦定宪法大纲》，作为制定“宪法”的准备。为此，立宪派先后发起三次速开国会的请愿运动，但很快被证明此路不通。1911年5月，清政府组织“皇族内阁”，不少立宪派人士认识到清政府实无诚意推行立宪，转而支持革命。

二、武昌起义与中华民国的建立

1911年5月，清政府将已归民间所有的川汉、粤汉铁路筑路权收归“国有”，随即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订立借款合同，四国银行团享有这两段铁路的修筑权和继续投资

的优先权，激起粤、鄂、湘、川等省人民的强烈愤慨，引发保路运动。四川保路运动发展成武装起义后，革命党人决定在武昌发动起义。1911年10月10日晚，革命力量雄厚的新军工程第八营打响了武昌起义第一枪。随后，新军其他各部的士兵纷纷响应，起义军很快控制了武汉三镇，并成立湖北军政府，推黎元洪为都督。武昌起义胜利后的两个月内，湖南、广东等14个省和上海纷纷宣布脱离清政府独立。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宣誓就任第一任临时大总统。新的共和政体就此产生。袁世凯在英国等列强支持下，奉清政府命率军南下攻陷汉口、汉阳，以武力威胁革命势力，又利用革命党人急于完成统一的愿望，诱使其展开和议。在重重压力之下，孙中山被迫发表声明：只要清帝退位，袁世凯赞成共和，即推举他做大总统。袁世凯随后又以南方革命党的共和要求，对已束手无策的清政府施压。1912年2月12日，清政府颁布《清帝逊位诏书》，宣告统治中国260多年的清王朝结束。2月15日，南方的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辛亥革命的成果就这样落到北洋军阀首领袁世凯的手中。为防止袁世凯专权，3月11日，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名义颁布了临时参议院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约法规定：中华民国的主权属于全体国民；民不分种族、阶级、宗教信仰，一律平等；国民有人身、居住、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宗教信仰及请愿、考试、选举、参政等自由和权利；以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员、法院行使其统治权，国务员须副署临时大总统公布的法律及命令等等。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实际上确立了责任内阁制，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重要文件。

三、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

辛亥革命拉开了中国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序幕。这次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中国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的共和政体，传播了民主共和理念，推动了中华民族思想解放，促使社会经济、思想文化和社会风俗等方面发生新的变化，冲破了封建主义的藩篱，打击了帝国主义在华势力，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是，辛亥革命并没有解决近代中国社会的根本矛盾，没有完成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它缺乏一个能够提出科学的革命纲领、能够发动广大民众，以及组织严密的革命政党的领导，这些是辛亥革命的历史局限。

第19课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政治、经济与文化

一、袁世凯复辟帝制与护国战争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随后一步步展开了独揽大权的活动。

1913年11月，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1914年5月公布的《中华民国约法》，改责任内阁制为总统制。同年底发布的《修正大总统选举法》，又规定总统任期十年，可连选连任。日本看到袁世凯大权在握，1915年1月，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列强无暇东顾的时机，向袁世凯提出把中国的部分领土以及政治、军事、财政等置于日本控制之下的“二十一条”要求。经过谈判，袁世凯最终于1915年5月被迫签订不平等的“中日民四条约”。

大权独揽的袁世凯，很快走上帝制之路。1915年10月，参政院以“尊重民意”为由，召开“国民代表大会”，表示一律“赞成”君主立宪。12月，袁世凯接受“劝进”当上了皇帝，以1916年为洪宪元年。面对袁世凯的倒行逆施，革命党人起而反抗。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组织中华革命党，武力讨伐袁世凯。袁世凯称帝的行径，更激起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1915年底，唐继尧、蔡锷、李烈钧在云南宣布独立，并组织护国军，发动护国战争，讨伐背叛共和的袁世凯。随后，贵州、广西、广东、浙江、湖南、陕西、四川等省相继宣告独立。1916年3月，袁世凯被迫宣布取消帝制，恢复中华民国纪年。

二、北洋时期的军阀割据

袁世凯称帝失败，不久死去，北洋军阀中难以产生一个能统御整个北洋派的人。北洋军阀内部派系纷争，很快发展为军阀混战与割据的局面。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在英美支持下，控制了直隶及长江中下游的苏、赣、鄂等省；皖系的段祺瑞在日本支持下，据有皖、浙、闽、鲁、陕各省；奉系的张作霖，同样以日本为靠山，占据东北三省。各军阀凭借手中掌握的军队，争权夺利，先后爆发直皖、直奉混战，导致北京政权实际上由不同的军阀所控制。袁世凯死后，段祺瑞在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出任掌握实权的国务总理。为了使权力合法化，段祺瑞重新召开被袁世凯解散的国会，但这次会议的进展并不顺利。

1917年5月，继任总统黎元洪免去段祺瑞总理职务，造成所谓的“府院之争”。随后，张勋以调解府院之争为名，率兵入京，解散了国会，拥清废帝溥仪复辟。张勋复辟失败后，冯国璋代行大总统职权，段祺瑞回到北京就任国务总理。但段祺瑞公然破坏《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拒绝恢复国会。1917年8月，南下的150余名国会议员在广州召开非常会议，决定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推举孙中山为大元帅。借孙中山的名望争权夺势的西南军阀，却千方百计排挤孙中山。1918年，孙中山愤而辞去大元帅之职，发表通电，痛心地表示：“顾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为争取国际地位，抑制日本在华势力的发展，1917年8月14日，中国向德、奥两国宣战，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协约国方面。随即，中国收回德、奥在天津、汉口的租界，撤销两国领事裁判权。十几万名中国劳工远渡重洋前往欧洲前线。中国劳工的巨大付出，为协约国一方取得胜利作出了贡献。

三、民国初年经济、社会生活的新气象

中华民国建立，扫除了政治上的一些束缚和障碍，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一定条件。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鼓励民间兴办实业。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列强忙于欧战，中国民族工业得到迅速发展，速度和规模甚至超过以往半个世纪所取得的成绩。与此同时，群众性的反帝爱国斗争此起彼伏，特别是1915年因反对“二十一条”掀起的抵制日货、提倡国货运动，有力推动了纺织、面粉等轻工业系统的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以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开办的面粉厂、纱厂等为代表的一批民族企业迅速壮大起来。随着民族工业的迅速发展，中国产业工人的人数也急剧增加，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

建立共和政体是中国历史上破天荒的大事，民众日常生活也出现了种种新气象。南京临时政府致力于社会生活方面的除旧布新，宣布改用阳历，颁布剪发辫、易服饰和废止缠足的法律；还颁布法令，革除“大人”“老爷”等清朝官场的称呼。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过去的陈规陋习不符合时代潮流，应接受文明开化的新习俗、新风尚。

四、新文化运动的开展

新文化运动是从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开始的。这场运动源于对辛亥革命失败原因的痛苦反思。人们认识到共和制度之所以不能真正得到巩固，中国的状况依然黑暗，根本原因在于缺乏对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的彻底批判，大多数国民的头脑仍被专制和愚昧牢牢地束缚着。

1917年初，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随即聘请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并延揽许多具有新思想的学者来北大任教。北京大学和迁往北京的《新青年》杂志，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成为编辑部成员，共同推进新文化运动。《新青年》阐述了新文化运动的主张：要拥护“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新文化运动也是一场文学革命。胡适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主张以白话文作为新文学的语言，得到广泛响应。经过新文化运动的倡导，白话文逐渐普及开来。

在《新青年》的有力推动下，各地拥护新文化运动的刊物纷纷出版，使全国报刊面貌为之一新。妇女解放、婚姻自由、家庭革命等口号的提出，也使这场运动所涉及的内容远比辛亥革命时期更为广泛和深刻。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推动思想文化革新，有着解放思想的重大意义。

第七单元 中国共产党成立与新民主主义革命兴起

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遭遇惨败，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五四运动由此爆发。五四运动后诞生的中国共产党，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指明了中国革命的方向。随后，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实现，推动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运动迅速展开。正当北伐军胜利进军的紧要关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国民革命失败后，国民政府加强了独裁统治。中国共产党开始认识到掌握武装力量的重要性，发动了一系列武装起义，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新道路。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被迫长征。红军长征的胜利，打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这一时期，民族资本主义取得了较大发展，但也面临着重重阻碍。

通过本单元的学习，认识五四爱国运动的历史意义，认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中国共产党成立对中国革命的深远影响；认识国共合作领导国民革命的历史作用；了解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认识中国共产党开辟革命新道路的意义；认识红军长征的意义。

第 20 课 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一、五四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1919 年 1 月，中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之一，参加了在法国巴黎召开的“和平会议”。中国代表提出废除外国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取消“二十一条”等，但英、美等国操纵的和会拒绝了中国代表提出的正义要求，竟决定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这一消息传到国内，激起人们郁积已久的愤怒，各界人士和爱国团体纷纷发表通电，斥责这一无理行径，并且要求中国政府坚决维护国家主权。这成为五四运动爆发的导火索。

5 月 4 日，北京大学等十几所学校的三千多名学生齐集天安门前，举行游行示威，高喊“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等口号。学生的爱国行动遭到北洋军阀政府的镇压，使得从北京开始的学生爱国运动迅速向全国发展。6 月 3 日和 4 日，北京大批学生被捕，消息传到上海。6 月 5 日，上海出现大规模的工人罢工和商人罢市。中国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推动着这场爱国运动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在巨大压力下，北京政府释放了被捕学生。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也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五四运动是一场以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为先锋、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是一场中国人民为拯救民族危亡、捍卫民族尊严、凝聚民族力量而掀起的伟大社会革命运动，是一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新知识的伟大思想启蒙运动。它推动了中国社会进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为新的革命力量、革命文化、革命斗争登上历史舞台创造了条件，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追求民族独立和发展进步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是从俄国十月革命后开始的，北京与上海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在 1919 年出版的《新青年》“马克思研究专号”上，李大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学说。1920 年 3 月，李大钊又发起中国最早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把一批经历过五四运动洗礼的优秀青年组织起来。

同年5月，陈独秀在上海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从日本留学回国的李达、陈望道、李汉俊等人，投身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翻译和宣传。

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以及中国工人运动的持续发展，创建工人阶级政党问题提到日程上来。1920年初，陈独秀和李大钊最早提出并推动在中国建立共产党。同年4月，共产国际派代表来到中国，先后与李大钊、陈独秀商议建党事宜。8月，上海发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10月，北京建立了共产党小组。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地也相继建立了共产党的早期组织。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出席会议的除毛泽东、董必武、李达等13名代表外，还有共产国际代表。由于法租界巡捕突然搜查会场，会议最后一天是在浙江嘉兴南湖一艘游船上进行的。大会通过的纲领，首先确定了中国共产党这个名称。大会明确了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是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大会还选举产生了党的领导机构，陈独秀任书记。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一个开天辟地的大事变，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力量。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有了正确的前进方向，中国人民有了强大的凝聚力量，中国命运有了光明的发展前景。从此，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

三、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积极投身工人运动，推动了一系列罢工运动的展开。在大力开展工人运动的同时，中国共产党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必须建立革命统一战线。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通过了关于国共合作问题的决议。1924年1月，在共产党人的参加与帮助下，孙中山在广州主持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新三民主义的主张。大会实际上通过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以国共合作为特征的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加速了中国革命的进程，以“打倒列强，除军阀”为目标的国民革命席卷全国。1925年，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通过再次东征消灭了陈炯明的势力，广东革命根据地得到巩固和统一。1926年，国共两党合作开始北伐。到1927年3月，革命势力从珠江流域发展到长江流域，基本推翻了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

随着革命高潮的到来，统一战线内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加剧，特别是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右派篡夺领导权的活动日益猖獗。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7月15日，汪精卫集团在武汉“分共”。至此，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由国共合作发动的国民革命失败。

第21课 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和中国共产党开辟革命新道路

一、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

1927年秋，武汉国民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合并，史称“宁汉合流”。它标志着中国国民党专制统治的确立。1928年，国民政府继续北伐，讨伐张作霖。日本帝国主义为阻挠北

伐，制造了“济南惨案”。蒋介石命令部队绕道开进。张作霖因战事不利，决定退回东北。日本见张作霖不能满足他们的侵略要求，在皇姑屯将他炸死。同年底，张作霖之子张学良通电全国，宣告东北三省服从国民政府，改旗易帜。至此，国民政府在形式上基本统一了全国。

国民政府建立以后，民族资产阶级兴办实业的热情有所提高。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蓬勃开展，抵制洋货、提倡国货的行动，为民族工业的发展创造了机遇。除了原有的纺织、面粉等行业外，民族工业中的新兴部门如化学、橡胶、搪瓷等，都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同时，官僚资本凭借国家权力，迅速聚敛起巨额财富，四大银行成为他们巧取豪夺的重要工具。

二、工农武装割据开辟革命新道路

国民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认识到掌握武装力量的重要性。为了挽救革命，中国共产党决定用武装起义来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

1927年8月1日，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了南昌起义。两万多起义军经过数小时战斗，全歼守敌，占领南昌城。随后，起义军撤出南昌，南下广东。10月初，起义军在潮汕地区遭到敌人的围攻而失败。起义军一部分在朱德、陈毅的率领下，转战湖南；另一部分转移到海陆丰地区，与当地农民军会合。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会议总结了国民革命失败的教训，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会上，毛泽东提出了“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重要思想。八七会议后，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赶赴湖南，组织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1927年9月，由于敌强我弱，起义军在进攻长沙途中受挫。毛泽东主持召开会议，决改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山区进军。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到达井冈山，开展游击战争，进行土地革命，建立红色政权，开始创建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1928年，朱德、陈毅率领的革命队伍到达井冈山，和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会师。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从此，中国革命走上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到1930年夏，全国已经建立起大小十几块农村革命根据地，分布在十多个省，革命武装力量达十万人。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选举产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建立，是中国共产党人创建人民革命政权的宝贵探索与尝试。各农村革命根据地逐步开展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受到广大农民的欢迎。他们拥护中国共产党，积极发展生产，支持革命。

三、红军长征

1930年10月，蒋介石调集重兵，向以中央根据地为重点的各革命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围剿”。到1933年3月，红军先后打退了国民党军队的四次“围剿”。9月，蒋介石自任总司令，调集100万军队“围剿”各革命根据地。由于共产国际的指导脱离中国革命实际，中共中央犯了“左”倾错误，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这时，“左”倾错误领导人又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中央红军在突破国民党军队的四道封锁线后，从八万余人锐减到三万余人。国民党当局集结重兵，布好口袋形阵势，企图将红军一网打尽。危急关头，毛泽东根据敌我双方的军事态势，建议中央红军放弃原定计划，立即改向敌军力量较薄弱的贵州挺进。

1935年1月，红军攻克贵州北部重镇遵义。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集中全力解决军事和组织问题。会议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会后不久，政治局常委决定由张闻天负总责，并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遵义会议开始确立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后，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指挥下，采取灵活多变的战术，声东击西，四渡赤水，使国民党军队疲于奔命，在巧渡金沙江后，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取得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接着，红军继续北上，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10月到达陕北吴起镇，与陕北红军会师。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地区会师，红军长征胜利结束。长征实现了红军的战略大转移，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在沿途播下了革命种子，鼓舞了广大人民群众，铸就了长征精神，打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第八单元 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

1931 年，日本侵略者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东北三省，激起中国民众的抗日救亡怒潮，中国局部抗战由此开始。1936 年，张学良、杨虎城受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发动西安事变，逼蒋抗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全国团结抗战局面初步形成。1937 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全民族抗战，国共合作抗日局面形成。国民党正面战场和共产党敌后战场战略配合，有效打击了日本侵略者。中国共产党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抗战，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中国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

1945 年 9 月，日本正式签署投降书，历时 14 年的抗日战争获得胜利。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坚持独裁统治，发动全面内战。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解放战争，在解放区进行土地改革，在国统区形成第二条战线。人民解放军实施战略进攻，赢得战略决战的胜利，加速了国民党统治的崩溃。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建立新中国的政策和主张。

通过本单元的学习，了解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罪行；了解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抗战，认识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团结抗战的中流砥柱；认识中国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理解 14 年抗战胜利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历史意义；了解全面内战的爆发及人民解放战争的进程，分析国民党反动统治覆灭的原因，探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中国革命胜利的原因和意义。

第 22 课 从局部抗战到全国抗战

一、局部抗战

1929 年秋，资本主义世界性经济危机爆发，严重影响日本。日本统治集团为缓和国内矛盾，摆脱困境，急于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1931 年上半年，日本政府及其在中国东北的殖民机构加紧进行武装侵略的部署。

1931 年 9 月 18 日夜，日本关东军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反诬中国军队所为，借此对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发动突然袭击，制造了九一八事变。这一事变标志着中国局部抗战的开始。次日晨，日军占领沈阳。随后，日军进一步扩大侵略，占据整个东北。

1932 年 1 月 28 日，日军又在上海挑起侵略战争。驻守上海的十九路军奋起抵抗，得到全国民众的积极支援。3 月，日本扶植清废帝溥仪做傀儡，在吉林长春建立伪满洲国。国民政府推行“攘外必先安内”方针，以主要力量“围剿”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对日本侵略实行不抵抗政策，寄希望于英美等国出面调停，幻想依赖国际联盟迫使日本撤兵。但国联调查团提出实行国际共管的方案，以牺牲中国来换取英、美、法、日等国共同控制中国东北。日本拒绝这个方案，宣布退出国联。日本对东北三省的大规模侵略强烈地震动了中国社会，在深重的民族危机面前，民众抗日救亡运动兴起。由游击队改编而成的东北人民革命军在极端困苦的环境下坚持抗战。1933 年，日军由东北向长城沿线进犯，遭到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

日本侵略者占领东北三省以后，又将侵略矛头指向华北，逼迫国民政府签署了一系列协定，实际上控制了热河、河北、察哈尔三省，进而又加紧策动所谓“华北自治运动”。日本蓄意制造的这一连串事件，总称“华北事变”。其中的“华北自治运动”激起北平学生 1935

年12月9日大规模游行示威，即一二·九运动。这一运动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救国主张，促进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抗日救亡运动掀起高潮。1936年，东北抗日联军发展到三万余人。在共产党员杨靖宇、赵尚志等领导下，东北抗日联军浴血奋战，牵制了大量日军。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蒋介石调集包括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在内的军队围攻陕北。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张学良和杨虎城在西北地区实行联共抗日。

1936年12月，蒋介石亲赴西安逼迫张学良、杨虎城全力“剿共”。张学良和杨虎城在反复劝说蒋介石应以国家和民族大义为重、容纳抗日主张的努力失败后，发动“兵谏”，于12月12日晨，扣留蒋介石，以武力逼蒋抗日，这就是“西安事变”。

面对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中共中央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派周恩来为代表，奔赴西安，与张学良、杨虎城一起，同国民政府代表举行谈判。经过各方努力，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它促进了中共中央联蒋抗日方针的实现。从此，十年内战的局面基本结束，全国团结抗战的局面初步形成。

二、全国抗战的开始

1937年7月7日晚，日军在北平西南的宛平城外卢沟桥举行“军事演习”，借口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城搜查。遭到拒绝后，日军竟然向宛平城射击，炮轰卢沟桥，中国守军奋起还击。这就是卢沟桥事变，又称七七事变。全国抗战由此开始。

卢沟桥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通电全国：“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要求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为保卫国土流尽最后一滴血！随后，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为了表示“团结各方共赴国难”，邀请各党各派及无党派人士分批在庐山开谈话会，听取各方人士对抗日救国的意见。在7月17日的第二次谈话会上，蒋介石发表准备抗战的讲话。

8月下旬，为了制定战胜日本侵略者的纲领、方针和政策，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洛川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作了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路线的形成。

为早日促成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周恩来向蒋介石递交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提出抗日的基本主张，重申共产党的各项保证。随后，红军主力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叶挺任军长。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国共合作抗战宣言。第二天，蒋介石发表谈话，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至此，在中国共产党推动下，国共第二次合作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中国共产党在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巩固和发展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三、日军的侵华暴行

1937年11月，国民政府撤离南京。12月13日，日军攻陷南京。日军在南京进行了持续六周的烧杀劫掠，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据战后中国南京审判日本战犯的军事法庭查证，日军占领南京后，屠杀手无寸铁的中国居民和放下武器的士兵30万人以上。

政治上，日本侵略者实行“以华制华”方针，在占领区扶植傀儡政权。1940年3月，在日本扶植下，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并签订大量卖国协定。经济上，日本侵略者实行“以战养战”，对占领区大肆进行野蛮的经济掠夺，垄断沦陷区工矿、金融、交通业。日军将粮食规定为军用物资，实行“粮食统制”，强行“征购”和“配给”，造成普遍的饥馑和死亡。他们还强迫青壮年到日本和中国东北做苦力。

日军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实施野蛮的烧光、杀光、抢光“三光”政策。1941至1942年，日军在华北连续五次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对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华北乡村变成一片焦土。1938年2月至1943年8月，日军对战时陪都重庆进行了长达五年半的战略轰炸和无差别轰炸。据不完全统计，重庆大轰炸的死者超过1万人，绝大多数为平民，市区大部分繁华地区被毁坏。

日军侵华期间，践踏国际公法，实施细菌战，残杀中国军民。九一八事变后，日军组建了细菌部队。1938年，细菌战元凶石井四郎的细菌部队迁至哈尔滨平房镇，成为臭名昭著的731部队。1938—1945年，731部队曾以活人试验和活人解剖等灭绝人性的手段杀害中国人、朝鲜人以及盟军战俘超过1万人。日军还在中国强征随军性奴隶，推行“慰安妇”制度，约20万中国女性遭受蹂躏。这是日本侵略者违反人道主义、违反国际法则的政府犯罪行为。

第23课 全民族浴血奋战与抗日战争的胜利

一、正面战场的抗战

1937年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将侵略矛头指向国民政府统治的中心区域。国民政府奋起自卫，组织了淞沪会战。11月中旬，日军占领上海，淞沪会战结束。在淞沪会战中，中国军队毙伤日军四万余人，粉碎了日军“三个月亡华”的狂妄企图。1937年9月，为阻止日军逼近山西太原，八路军在平型关伏击日军，取得平型关大捷。随后，忻口会战历时近一个月，是抗战初期华北战场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的一次战役。11月初，太原失守。日军占领南京后，从南北两端沿津浦铁路夹击徐州。

1938年1至5月，国民政府调集60万大军，在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的指挥下展开徐州会战。中国军队在台儿庄地区围歼日军一万余人，取得台儿庄大捷，这是抗战以来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取得的最大胜利。

1938年6月中旬，武汉会战开始。会战前，毛泽东在延安发表《论持久战》的演讲，总结全国抗战开始以来的战争形势，针对国内存在的“中国必亡论”和“中国速胜论”，科学论证了中国必须通过持久作战赢得对日作战最后胜利的战略指导理论，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10月下旬，武汉失守，武汉会战结束。这是抗战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共毙伤日军近四万人。与此同时，南部重镇广州也被日军占领。武汉、广州陷落后，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抗战相持阶段中，中国军队继续奋勇抗击日军。在1941年12月开始的第三次长沙会战中，面对十余万日军的进攻，中国军队重兵防御，拼死抵抗，歼灭大批日军，最终取得会战胜利。此时，英美盟军在太平洋战场接连败退。长沙会战的胜利，在国内外产生了积极影响。

抗战时期的中国，国家的经济实力、军事能力和技术水平，都远远落后于日本，难以抵挡日军深入国土。但中国人民的抗敌意志高昂，除军事抵抗之外，东部沿海工业大规模向西南大后方迁移，华北、华东各著名高校师生带着大量书籍和实验设备长途跋涉，迁到西南、西北大后方。这些壮举，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决心，为抗战胜利奠定了物质和精神基础。

二、敌后战场的抗战

上海、太原失守后，八路军、新四军按照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建立了多个巩固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根据地军民依据各地不同地形特点，采取地道战、地雷战、夜袭战、麻雀战等战法打击日军，使日军攻防无措，疲于奔命。敌后战场的开辟，战略上配合了正面战场作战，牵制了在华日军一半以上的兵力。在沦陷区，中国共产党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领导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在积极开展抗日宣传的同时，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沦陷区的工人以怠工、罢工等斗争形式，破坏日军掠夺中国资源实行“以战养战”的部署，还通过利用日伪矛盾发动群众进行斗争，打击日本的殖民统治秩序。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图谋以“囚笼政策”消灭敌后抗日根据地。1940年8月至次年1月，八路军以破袭日军华北交通线为主要目标，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进攻作战。随着战役的展开，八路军参战部队达到105个团，约20余万人，称为“百团大战”。百团大战共进行大小战斗1800多次，毙伤日、伪军2万多人，破坏铁路474千米公路1500多千米，摧毁大量敌人据点，缴获大批枪炮、物资，打破了日军的“囚笼”。敌后战场逐渐成为全国抗战的主战场。

此时，国民党消极抗战，反共倾向日益增长。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突袭“围剿”新四军，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引发了中共和民主人士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等的抗议。共产党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一面从政治上坚决打退国民党的反共高潮，一面坚持艰苦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不断巩固和扩大抗日民主根据地。根据地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建设成效显著。以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在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同时，精兵简政，以“三三制”为原则，开始实行“普遍、自由、直接、平等”的选举制度。其他敌后抗日根据地，也仿照陕甘宁边区，实行民主选举。

三、东方主战场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中国各民族、各政党、各政治派别求同存异，共同抗敌。海外华侨在陈嘉庚等侨领的号召和领导下，积极捐款捐物，支援抗战，数万华侨青年回国参战。日本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

1941年6月22日，德国法西斯大举入侵苏联，苏德战争爆发。12月7日，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偷袭美国在太平洋的主要海军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的抗日战争与美、英在太平洋战场对日作战密切地联系起来。中国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所抗击的日军兵力，超过了太平洋战场上日军的总兵力。

中国战场协助和配合了盟军作战，给予盟军以战略上和资源、情报上的重大支持。中国积极倡导建立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实际参与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谋划和指挥。中国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

1942年初，以中、美、英、苏为首的26个参加对德、意、日轴心国作战的同盟国家，在华盛顿签署《联合国家宣言》，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正式形成。随后，中国远征军开赴缅甸，救援在日军追击下仓皇撤退的英军，战绩名扬海外。

1943年11月，中、美、英三国政府首脑在埃及开罗举行会议，通过《开罗宣言》，决定了对日作战以及战后处置日本的基本策略，规定日本所窃取的中国领土，例如东北地区、台湾及其附属岛屿、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同年，通过谈判，中国与美、英达成协议，废除不平等条约，取消在华特权，订立新的条约；接着又与10余个西方国家废除旧约，签订新约。

四、抗日战争的胜利

在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夜，为了系统地总结中国革命的基本经验，为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作准备，1945年4至6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隆重举行。毛泽东在会上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共七大提出了党的政治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中共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选举产生新的中央委员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共七大使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

1945年5月，德国无条件投降。8月6日和9日，美国先后在日本广岛、长崎投下两枚原子弹。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8月9日，苏军进入中国东北，与中国军民一道，迅速消灭日本关东军。同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解放区战场展开全面反攻。8月15日，日本天皇发布无条件投降诏书。9月2日，在东京湾的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举行日本投降签字仪式。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10月25日，陈仪在台北代表中国政府庄严宣布台湾光复。从此，台湾作为中国的一个省，回到祖国怀抱。在全民族团结抗战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人民军队发展到约132万，建立了19块根据地，解放了近1亿人口，收复了100万平方千米的失地。历经14年的艰苦抗战，中国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军民伤亡总数在3500万人以上，经济损失超过6000亿美元。抗日战争的胜利，是近代以来中国抗击外敌入侵所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对维护世界和平的伟大事业产生了重要影响，重新确立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使中国人民赢得了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尊敬。这一伟大胜利，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开启了古老中国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新征程。

第24课 人民解放战争

一、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

抗日战争胜利后，和平建国是中国人民的强烈愿望。当时的中国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建国方针：中国共产党以和平、民主、团结为号召，主张成立联合政府，力争建成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国民党打着“和平建国”的旗号，坚持独裁和内战的方针。

在这种背景下，1945年8月，蒋介石接连三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举行和平谈判。中共中央决定接受邀请，争取和平民主新局面。8月底，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乘专机抵达

重庆。重庆谈判历时 43 天。1945 年 10 月 10 日，国共双方代表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规定：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

1946 年 1 月 10 日，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青年党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案等五项协议。但是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很快否决了这些协议。

二、全面内战的爆发

1946 年 6 月，国民党以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向解放区展开大规模的进攻，全面内战爆发。全面内战开始时，国民党在军队数量、军事装备、后备资源及外来援助等方面，都明显超过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准确地估计国际国内形势，确定了自力更生、以自卫战争粉碎国民党军队进攻的方针。1946 年 7 至 10 月，人民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军队约 30 万人，后又经过 4 个月作战，进一步挫败国民党的全面进攻。

1947 年 3 月，国民党军队发动对陕北解放区和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毛泽东、周恩来等率领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主动撤出延安，转战陕北。彭德怀率领的西北野战军先后取得青化砭、沙家店等战役的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陕北解放区的重点进攻；华东野战军在陈毅、粟裕指挥下在山东孟良崮消灭国民党王牌主力整编第七十四师，打退了敌人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

三、国民党政权的统治危机

全面内战爆发后，国统区财政经济逐渐陷入崩溃的境地。为了维持战争的庞大开支，国民政府无限制地发行纸币。1948 年前八个月纸币的发行量已经是 1937 年全年发行量的 47 万倍。随之而来的是恶性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国民党的反动政策和官僚资本的巧取豪夺，使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受到残酷的压迫和剥削，民族资产阶级也受到排挤和打击，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下降，民不聊生。国民党在人民中的信誉一落千丈。

1946 年 11 至 12 月，在内战声中，国民党包办的“国民大会”在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同盟坚决反对，拒绝出席。出席大会的国民党代表占 85%，此外是依附于国民党的青年党、民主社会党和若干“社会贤达”。会议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不过是国民党专制统治和蒋介石独裁的装饰品，进一步暴露了国民党当局坚持独裁和内战的真面目。

四、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为了推动解放区的土地改革，1947 年夏，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在河北平山西柏坡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制定了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制度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各解放区贯彻全国土地会议的精神，掀起土地改革群众运动，使亿万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获得了解放。经过人民解放军一年的作战，战争形势发生重大变化。

1947 年 6 月，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 12 万人，一举突破黄河天险，千里跃进大别山，直接威胁到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南京、武汉，揭开了战略进攻的序幕。

1948 年秋，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夺取全国胜利的决定性阶段。9 月，东北野战军发动声势浩大的辽沈战役。辽沈战役历时 52 天，歼敌 47 万余人，东北全境解放。人民解放军从此在数量上取得对国民党军队的优势。11 月初，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发起规模空前的淮海战役。淮海战役历时 66 天，共歼灭国民党军 55 万余人，南线国民党军队的精锐主力已被消

灭，长江中下游以北广大地区获得解放。11月下旬，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第二、三兵团联合发动平津战役。平津战役历时64天，共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队52万余人，基本解放华北全境。毛泽东在河北平山西柏坡世界上最小的指挥部里，指挥了世界上最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并且取得了三大战役的完全胜利。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是国共两党的战略决战，共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队154万余人，基本摧毁了国民党的主要军事力量，为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1949年春，中共在河北平山西柏坡召开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了促进革命取得全国胜利的基本方针，指出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转移到城市，提出了革命胜利后党在各方面的基本政策。毛泽东提醒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经过三大战役，国民党在长江以北的军事力量已全线崩溃。迫于内外压力，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宣告引退，由李宗仁代理其总统职务。李宗仁表示愿以中共提出的条件为基础进行和平谈判。1949年4月，以周恩来为首席代表的中共代表团和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的国民党南京政府代表团，在北平举行和平谈判。但国民党最终拒绝在双方代表达成的《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谈判破裂。

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在西起湖口、东至江阴的千里战线上，分三路发起渡江战役，迅速突破长江防线。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反动统治覆灭，中华民国时期结束。

国民党因其不能解决中国社会的根本矛盾，不能应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要求，不能代表广大民众的切身利益，从而失去了民众的支持，丧失了统治权。中国共产党能够始终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代表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得到了广大民众的支持，故能领导人民取得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是20世纪人类历史上最具影响的伟大事件之一。

第九单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

1949至1978年，是新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时期。站起来的中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成果的基础上，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历史性转变，全面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后，新中国以苏联的经验教训为鉴戒，独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曲折探索中积累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发展了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古老的中国以崭新的姿态屹立在世界东方。

通过本单元的学习，认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伟大意义；了解新中国巩固人民政权的主要举措；认识新中国为民主政治建设和向社会主义过渡所作出的努力；了解20世纪50至70年代中国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曲折发展和成就，认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及教训；理解政治、经济、外交、国防等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在新中国历史上所具有的开创性、奠基性意义；了解和感悟这一时期中国人民艰苦奋斗、奋发图强的精神风貌；了解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贡献，认识毛泽东思想对近现代中国的深远影响。

第25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各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少数民族、国外华侨以及特邀代表等662人参加了会议。

毛泽东在全体会议上致开幕词，指出：“我们的会议是一个全国人民大团结的会议。”“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大会一致决定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名，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等重要文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是新中国的建国纲领，具有临时宪法的作用。大会选举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毛泽东为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

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决议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施政方针。政府主席、副主席和委员就职，周恩来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下午三时，盛大的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结束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长期压迫和剥削中国各族人民的历史，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为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创造了前提条件。中华民族开始以崭新的姿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历史进入新纪元。

二、人民政权的巩固

新中国成立时，国民党残余军队还盘踞在华南、西南地区。人民解放军仍在进行人民解放战争的后期作战，肃清土匪和一切反革命武装。为了巩固人民政权，新中国必须完成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克服财政经济上的巨大困难，应对美国发动的侵朝战争给国家带来的安全危害。新中国刚成立时，全国尚有约占总数 2/3 的农民被束缚在封建土地制度之下。1950 年夏，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到 1952 年底，除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外，土地改革在全国大陆基本完成，约三亿无地少地的农民共获得约七亿亩土地。农民从封建土地制度的束缚中彻底解放出来，农村生产力得到大解放，为中国逐步实现工业化扫除了障碍。

1952 年，全国粮食产量比 1949 年增加了 49%。新中国面临一个经济上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国家财政困难，投机商人趁机抢购物资，囤积居奇，拒用人民币，倒卖银元，加剧物价飞速上涨。为制止投机资本制造的市场混乱，党和政府采取有力的经济措施和必要的行政、法律等手段，同上海等大城市的投机资本进行“银元之战”和“米棉之战”。到 1950 年春，全国物价趋于稳定，结束了连续十几年物价暴涨的局面，人民政府赢得了全国人民的信任。为了从根本上稳定物价，政务院通过采取统一全国财政收支管理、物资管理、现金管理等措施实现了国家财政经济的统一。经过一系列努力，到 1952 年底，解放前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得到全面恢复。

1950 年 6 月 25 日，朝鲜内战爆发。美国政府从其全球战略和冷战思维出发，作出武装干涉朝鲜内战的决定，并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阻挠中国的统一大业。美国还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组成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直逼中朝边境的鸭绿江和图们江，扩大侵朝战争，严重威胁中国国家安全。1950 年 10 月，应朝鲜党和政府请求，中国党和政府决定入朝作战。毛泽东派遣以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战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与朝鲜军民并肩作战。经过五次战役，中朝军队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美国被迫同意进行谈判。志愿军入朝后，国内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有力地支援了抗美援朝战争。经过边谈边打、反复较量，1953 年 7 月，美国不得不在停战协定上签字，中国人民取得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抗美援朝战争打出了国威和军威，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志愿军涌现出杨根思、黄继光、邱少云、罗盛教等 30 多万名英雄功臣和近 6000 个功臣集体，他们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汇成强大的民族凝聚力，锻造了伟大抗美援朝精神，极大地鼓舞着全国人民为保卫和建设祖国而团结奋斗。

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是中国人民站起来后屹立于世界东方的宣言书，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重要里程碑。

三、开创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

新中国成立后，按照“一边倒”方针，先后与苏联以及保加利亚、朝鲜、越南等十个人民民主国家建交。按照“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方针，新中国先谈判再建交，同印度、印度尼西亚、缅甸、巴基斯坦以及瑞典、丹麦、瑞士、芬兰建交。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一次建交高潮。同时，新中国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

1954 年 4 月，讨论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召开。新中国首次以五大国之一的地位和身份参加这次讨论国际问题的重要会议。朝鲜问题因为美国的阻挠未达成任何

协议。印度支那问题由于中国作出的努力得以政治解决，显示了刚刚登上国际舞台的新中国在通过谈判解决国际争端、维护世界和平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

1953年12月，中印两国就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一些问题举行谈判，周恩来在接见印度代表团时第一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得到印度方面的赞同，并写入两国的协定。1954年6月，在日内瓦会议休会期间，周恩来应邀访问印度和缅甸。中印、中缅双方总理在联合声明中，正式倡议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国际关系准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措辞前后稍有改变，最终确定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

1955年4月，亚非会议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这是战后第一次没有西方殖民国家参加的国际会议。会议上，中国提出并坚持“求同存异”的方针，推动会议朝着达成协议的方向前进，避免了可能走上歧路的危险。中国代表团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为进一步开展同亚非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创造了条件。亚非会议后，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取得了新进展。从1954年9月至1956年，中国与挪威、南斯拉夫、阿富汗、尼泊尔、埃及、叙利亚、也门等国建交，同英国、荷兰建立了代办级外交关系。

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

1953年，中国共产党根据国内经济、政治条件及国际形势的变化，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实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过渡时期中，我国成功开辟出一条适合自身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1956年底，我国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标志着生产资料公有制占绝对优势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我国初步建立起来。经过有计划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完成，我国开始改变工业落后的面貌，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提高。

1954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是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体现了人民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大会确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基本政治制度，它们初步构成了我国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体系。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在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过程中，毛泽东发挥了独特的作用。毛泽东思想不仅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指导思想，也是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

第26课 社会主义建设在曲折中发展

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1956年，中共八大举行。大会宣布：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

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

这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一次成功探索。

1957年春，毛泽东提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思想，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这个论述为认识中国基本国情奠定了理论基础。接着，全党整风运动和全国反右派斗争开展起来，但反右派斗争被严重扩大化了。

1958年，中共中央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全国掀起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总路线反映了广大人民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但由于片面追求经济建设高速度，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加上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以及当时的自然灾害等因素，1959至1961年，我国经济发生了严重困难。为了克服困难，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同时对政治、文化、教育、科研、民族、知识分子等方面政策进行重要调整。1962年初召开的七千人大会比较深入地总结了经验，取得了重要成果。1962年下半年到1965年，国民经济稳步增长，接近并超过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高水平。1964年，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提出建设“四个现代化”的伟大目标，大地激发了亿万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积极性。

二、“文化大革命”

20世纪60年代中期，毛泽东认为党和国家面临着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危险。为此，他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想通过发动“文化大革命”来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文化大革命”在1966年夏全面发动起来后，陈伯达“打倒一切”和“踢开党委闹革命”。1967年初，“全面夺权”的“一月风暴”发生。许多地方出现造反派组织的打、砸、抢事件，学校停课，工厂停工，党政机关受到冲击，大批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遭到批判和揪斗，社会和生产秩序陷于混乱。内乱局面引起老一辈革命家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严重忧虑和愤怒。他们对江青等人的倒行逆施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但遭到了压制和打击。

1969年4月，中共九大召开。1971年9月，林彪反革命集团策动武装政变，阴谋夺取最高权力。毛泽东、周恩来粉碎了这次政变。1972年，周恩来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批判极左思潮，使各项工作出现转机，但遭到江青等人的反对。

1975年，周恩来病重，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领导进行了各方面的整顿，经济形势有了明显好转。这些整顿实际上是后来拨乱反正的预演。江青等人极力反对邓小平领导的整顿，使国民经济再度恶化。人民群众对“四人帮”的抵制、抗争进一步发展。

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江青反革命集团加紧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同年10月，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而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三、伟大的建设成就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的这段历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艰辛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时期。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从总体上看，全党、全国人民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战胜各种困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要成果。

我国在工业、农业、科技、国防、外交、文化教育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从“一五”时期起到“四五”时期，我国逐步建成了一批门类比较齐全的基础工业项目，涉及冶金、汽车、机械、煤炭、石油、电力、通信、化工、国防等诸多领域，为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大规模的三线建设不仅增强了国防力量，而且改善了工业布局。我国成功地爆炸了原子弹、氢弹，试制并成功发射了中远程弹道导弹和人造卫星。这期间建设起来的一些基础设施、基础项目和大中型企业，至今仍在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同时，通过兴修水利、开展农田基本建设、培育推广良种、提倡科学种田，我国较大幅度地提高了粮食生产水平和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人民物质生活 and 文化生活水平得到逐步提高。教育事业取得长足进步，医疗卫生事业也得到蓬勃发展。劳动者的整体素质有了很大提高，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各方面的骨干力量大批地成长起来。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广大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涌现出无数先进典型和英雄模范人物，形成了具有特定内涵的时代精神。“铁人”王进喜、党的好干部焦裕禄、解放军好战士雷锋等，都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以李四光、钱学森、邓稼先、华罗庚等为代表的一批著名科学家，在科技事业和经济文化建设事业中作出重大贡献，成为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

20世纪70年代，中国外交打开新局面，迎来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与世界各国建交的又一次高潮。与中国建交国家的数量从1965年的49个增加到1976年的111个。其中，大多数是发展中国家。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1972年，中美两国结束了长期敌对状态，开始走向关系正常化；中日正式建交。这些外交成就极大地改善了中国的安全环境，拓展了外交活动的舞台。这些成就在新中国历史上都具有开创性、奠基性的意义，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第十单元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1992年，以邓小平南方谈话和中共十四大为标志，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1997年和1999年，香港、澳门回归祖国，中国政府恢复对香港、澳门行使主权。20世纪末，我国人民生活实现总体小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推向21世纪。中共十六大以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我国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大幅提升，科技实力、国防实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2010年起，我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

通过本单元的学习，认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意义；了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国在各个领域取得的成就、综合国力及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高；认识“一国两制”对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重大意义；认识邓小平理论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作用；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推进作用。

第27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与发展

一、伟大的历史转折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以邓小平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重要讲话为指导，决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作出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全会重新确立了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恢复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审查解决了历史上遗留的一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国家按照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加快平反冤假错案的步伐。“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的各级党、政、军干部陆续得到平反，受到打击、诬陷或迫害的民主党派人士和知识分子等也恢复了名誉。国家还改正了错划右派分子的案件，摘掉地主、富农分子的帽子，为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落实政策，将小商小贩、手工业者等劳动者同原工商业者区别开来，支持民主党派恢复活动，认真落实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重申侨务政策等等。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审议和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科学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对统一全党思想，开展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打下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恢复和发展，1982年底，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部宪法增加了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规定，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进入新的阶段。

二、改革开放进程

改革首先在农村取得突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推广开来，农业总产值和农民收入明显增加。同时，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以扩大企业自主权为主要内容进行试点。1984年，城市改革全面展开，国营企业广泛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外商投资企业也发展起来。对外开放迈出重大步伐。1980年，党和国家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立经济特区。我国还相继开放沿海港口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建立海南经济特区、上海浦东新区。

1982年，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开幕式上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重大命题，对全面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部署。1987年，中共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制定了“三步走”的现代化发展战略。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深刻阐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计划和市场的关系等重大问题，强调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对加快推进改革开放产生深远影响。

1992年，中共十四大在北京举行。大会号召抓住机遇，加快发展，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明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随后，我国按照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总体思路推进国有企业改革。1997年，中共十五大提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明确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更深层次地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央还提出并实施了科教兴国、可持续发展、西部大开发、“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等重大战略，有力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跨世纪发展。

2002年，中共十六大在北京举行。大会明确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强调21世纪头20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十六大以后，我国积极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推动经济又好又快发展。2007年，中共十七大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内涵，提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新要求。我国不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成功应对各种风险挑战，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坚实基础。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概括提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逐步形成的。中共十七大首次概括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现全党工作中心向经济建设的转移，实行改革开放，开辟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阐明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创立了邓小平理论，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1997年中共十五大上，邓小平理论被写入党章，并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

1989年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加深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积累了治党治国新的宝贵经验，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在2002年中共十六大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被写入党章，并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

中共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新的发展要求，深刻认识和回答了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形成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成功在新形势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2007年中共十七大上，科学发展观被写入党章。在2012年中共十八大上，科学发展观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

第28课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

一、综合国力不断提升

在全面改革的推动下，1984年至1988年，我国经济加速发展。五年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2.1%，工业总产值达6万多亿元，国家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迈上了一个新台阶。1990年，“七五”计划所规定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各项指标绝大部分完成或超额完成，提前实现了第一步战略目标。人民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全国绝大多数地区解决了温饱问题，开始向小康社会迈进。国家在科学技术多个领域取得新成就。1983年，我国研制成功第一台亿次巨型计算机——“银河-I”，填补了国内巨型计算机研制的空白。1988年，我国第一座高能加速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对撞成功。1991年，我国自行设计、自行建造的核电站——秦山核电站并网发电。

进入20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进一步推进，我国取得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和一系列重大斗争的胜利。2000年，“九五”计划的主要任务完成或超额完成，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0多万亿元，年均增长8.6%；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的目标在1997年提前3年完成；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位居世界前列，商品短缺状况基本结束。城乡居民收入大幅度增加，生活质量显著提升。我国实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第二步战略目标，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科技事业取得巨大成就。1999年，第一艘无人实验飞船“神舟一号”的成功发射，标志着我国在载人航天飞行技术上获得重大突破。1999年“神威”计算机的问世，打破了西方国家在高性能计算机技术方面的封锁。长江三峡水利枢纽、西电东送、青藏铁路、西气东输等一批重大工程捷报频传。

进入21世纪，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国家战胜非典疫情，夺取汶川抗震救灾胜利，成功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国民经济保持较快增长。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超过40万亿元，经济总量跃升至世界第二位。2006年，国家取消农业税并出台了一系列强农惠农富农政策，粮食产量自2004年起实现8年连续增长。人民生活明显改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分别增长9.7%和8.9%。全民医疗保障体系初步形成，覆盖人数超过13亿。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现全覆盖，城乡社会救助体系基本建立。重要学科前沿和战略必争领域取得一批重大自主创新成果，“神舟五号”飞船首次实现载人航天飞行，“神舟七号”

飞船航天员成功进行中国人的第一次太空漫步，“嫦娥一号”首次完成绕月探测。到2011年，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一电子信息产品制造大国，计算机等电子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位，互联网网民数量居世界第一位。

2010年5月1日至10月31日，第41届世界博览会在上海举行。10月1日，中国国家馆日升旗仪式在世博园中国馆前广场举行。

二、“一国两制”与祖国统一大业

20世纪80年代初，针对台湾问题，邓小平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但首先被运用于解决香港、澳门问题。“一国两制”就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国家的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台湾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1984年12月和1987年4月，中国政府分别同英国和葡萄牙政府签署了中英、中葡联合声明。1997年7月1日，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正式成立。1999年12月20日，中国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正式成立。香港、澳门的回归，标志着祖国统一大业向前迈出重要一步。

香港、澳门回归后，中央政府严格按照宪法和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办事，全力支持特别行政区政府依法施政、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取得显著成绩。2003年，中央政府先后与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签署关于内地与香港、澳门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及其补充协议，促进内地与港澳之间的货物、服务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实现了港澳与内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同时，开放内地部分城市居民个人赴港澳旅游，扩大人民币在香港、澳门业务，推动内地企业在香港上市。2011年，香港地区生产总值较回归前的1996年增长54%，澳门地区生产总值较2000年翻了两番多，年均增长率达12.5%，香港、澳门社会保持稳定，经济更加繁荣，显示了“一国两制”方针的强大生命力。

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后，中国政府推动大陆同台湾同胞的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促进双方人员往来。1992年11月，大陆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与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就解决两岸事务性商谈中如何表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问题，达成“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共同努力谋求国家统一”的共识，后被称为“九二共识”。1993年4月，海协会会长汪道涵、台湾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在新加坡举行会谈。汪辜会谈标志着两岸关系发展迈出了重要一步。经过海峡两岸同胞的共同努力，两岸往来日渐频繁，民间交往不断扩大，经贸合作蓬勃发展。

进入21世纪，“台独”分裂活动不断加剧，党和国家将反对和遏制“台独”摆在对台工作更加突出的位置。2005年3月14日，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反分裂国家法》，表明全中国人民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共同意志和坚定决心。2005年4月，胡锦涛邀请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访问大陆，成功开启两岸政党交流。双方达成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谋求台海和平稳定、促进两岸关系发展等多项共识。2008年12月，两岸海运直航及直接通邮正式启动，两岸全面直接双向通邮、通商、通航的“三通”迈开实质性步伐。大陆方面还实施多项对台惠民政策措施，两岸在学术、文化、教育、体育等方面的交流交往不断深化。

三、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的外交政策朝着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方向进行战略性调整。根据国际形势变化，邓小平明确提出“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的论断，主张世界上所有国家不论大小、富贫、强弱一律平等；中国决不称霸，也坚决反对任何霸权主义。中国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对一切国际问题都根据其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态度和对策，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为借口，占领别国领土、干涉别国内政。1978年8月，中国同日本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1979年1月，中美两国正式建交。1989年，中苏两国实现关系正常化。随着外交方针政策的调整，中国外交得到全方位发展，一个有利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外部环境初步形成。到1992年，同中国建交的国家达154个。

20世纪90年代，我国积极发展新型大国关系，分别同俄罗斯、美国、法国、英国、日本及欧盟等建立了发展面向21世纪双边关系的基本框架。1999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大使馆。2001年，美国战机在中国南海空域挑衅，发生了撞机事件。面对美国侵犯中国主权的野蛮暴行和在双边关系中挑起的种种事端，中国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维护了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中国积极发展同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睦邻友好关系，倡导并推动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成立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以更加开放的姿态积极参与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多边外交活动。2001年，中国在上海成功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促进亚太地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产生积极影响。世纪之交，我国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外关系新格局，国际影响力显著提高。

进入21世纪，我国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各国共同发展，提出“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的外交总体布局，积极开展一系列富有成效的外交活动。中美关系总体稳定，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周边关系取得突破。2002年11月，中国同东盟国家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为相关国家在南海开展务实合作奠定了政治基础。2003年，中国与欧盟确定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双方经贸合作迅速发展。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致力于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从2009年开始，中国和其他金砖国家领导人建立定期会晤机制，增强了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中国还积极参与安全与反恐等全球性问题的国际合作，充分展示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第十一单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迎难而上、开拓进取。中共十九大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将其写入宪法。十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攻克了许多长期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事关长远的大事要事，“十三五”规划目标任务顺利完成，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共二十大提出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行了战略谋划，为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通过本单元的学习，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意义，认清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认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第 29 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一、中共十八大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2012 年 11 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这是在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定性阶段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胡锦涛代表十七届中央委员会作题为《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的报告。中共十八大贯穿始终的主线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会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 90 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发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总布局是“五位一体”，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大会提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 100 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大会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确定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中共十八届一中全会选举习近平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2013 年 3 月，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选举习近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等重要场合阐明中国梦的本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这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必须凝聚中国力量，这就是中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力量。中国梦是国家的梦、民族的梦，也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梦。

二、中共十九大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2017 年 10 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习近平作题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报告。大会的主题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大会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关

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大会确定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目标，对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作出分两个阶段推进的战略安排：从 2020 年到 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 2035 年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大会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中共十九届一中全会选举习近平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2018 年 3 月，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载入宪法，会议选举习近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对关系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深邃思考和科学判断，就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原创性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创立者。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 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

2021 年 11 月，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决议》科学总结了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明确提出确立习近平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心愿，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

三、中共二十大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2022 年 10 月，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习近平作题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的报告。大会的主题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自信自强、守正创新，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大会强调，中共十八大召开十年来，我们经历了对党和人民事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三件大事，即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完成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大会提出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中共二十届一中全会上，习近平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2023 年 3 月，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选举习近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第30课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

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2015年10月，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提出要下大力破解制约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点难点问题，强调“小康”讲的是发展水平，“全面”讲的是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

打赢脱贫攻坚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2013年，习近平提出了“精准扶贫”理念。经过努力，到2020年11月，我国最后九个贫困县实现贫困退出，这标志着我国在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大步。2021年2月，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习近平庄严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脱贫攻坚伟大斗争，锻造形成了脱贫攻坚精神。我国提前十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重大贡献。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我国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书写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我国发展具备了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二、综合国力显著提升

十年来，我国经济实力实现历史性跃升。国内生产总值2021年达到114万亿元，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比重达18.5%，稳居世界第二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加到8.1万元，接近高收入国家门槛。制造业规模、外汇储备、谷物总产量稳居世界第一位。基础设施建设在众多领域走在世界前列，高速铁路运营总里程达到4.2万千米，高速公路里程突破17万千米，都居世界首位。机场港口、水利、能源、信息等基础设施建设取得重大成就。

国家加快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全社会研发经费增加到2.8万亿元，居世界第二位，增速达12.3%，明显快于发达国家，研发人员总量居世界首位。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不断加强，一些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突破，载人航天、探月探火、深海深地探测、超级计算机等取得重大成果，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

人民生活全方位改善。人均预期寿命增长到78.2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到3.5万元。国家推进教育强国建设，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教育普及水平实现历史性跨越。我国还建成世界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医疗卫生体系，基本养老保险覆盖10.4亿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稳定在95%。共同富裕取得新成效。

国防和军队改革取得历史性突破，重构人民军队领导指挥体制、现代军事力量体系和军事政策制度，全面推进国防科技创新。国产航母、新型核潜艇、歼-20、运-20、东风系列导弹等大国重器列装，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

三、在应对风险挑战中推进各项事业

2018年以来，我国外部形势发生深刻复杂变化，特别是美国单方面执意挑起中美经贸摩擦，对我国进行遏制打压，给我国经济运行带来不利影响。面对国际上保护主义的抬头、

单边霸凌的逆流，我国采取有力反制措施，坚决捍卫自身合法利益，捍卫自由贸易和多边体制，坚定地站在历史前进的正确一边。

2019年6月，香港爆发“修例风波”，充分暴露出香港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存在的制度漏洞。中央政府坚定支持香港特别行政区依法打击和惩治暴力犯罪活动，止暴制乱，恢复秩序。2020年6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并将该法列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明确由香港特别行政区在当地公布实施，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制度机制作出法律化、规范化、明晰化的具体安排。这一重大举措，全面贯彻“爱国者治港”原则，推动香港局势实现由乱到治的重大转折。国家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支持香港、澳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香港、澳门保持了长期稳定发展良好态势。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2015年11月7日，两岸领导人习近平、马英九在新加坡会面，就进一步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交换意见。这是1949年以来两岸领导人的首次会面，翻开了两岸关系历史性一页。

在中国共产党的引领推动下，两岸交流合作日益广泛，2021年两岸贸易额增长至3283.4亿美元，是1978年的7000多倍，给台湾同胞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有关部门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为台湾同胞来大陆学习、创业、就业、生活提供同等待遇，分享大陆发展机遇。

2016年民进党上台后，“台独”势力猖獗。面对“台独”势力分裂活动和外部势力干涉台湾事务的严重挑衅，中共十九大鲜明地提出，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在任何时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我们开展了反分裂、反干涉重大斗争，牢牢把握两岸关系主导权和主动权。中共二十大重申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强调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要由中国人来决定。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的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祖国完全统一一定要实现，也一定能够实现！

2020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暴发，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遭遇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科学精准防控，因时因势优化调整防控措施，最大限度保护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积极成果，铸就了伟大抗疫精神。

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世界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之中。2014年11月，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战略思想，指出中国必须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要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牢牢把握坚持和平发展、促进民族复兴这条主线，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保障。

2013年3月，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首次向国际社会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2015年9月，习近平在联合国大会的演讲，全面阐述人类命运共同体内涵，呼吁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同，被写入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各种复杂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写入我国宪法序言。

中国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走和平发展道路，反对一切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以及任何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凌行径。中国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倡导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致力于携手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截至 2023 年 3 月，中国已同 182 个国家建交，同 110 多个国家和地区组织建立了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

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建设，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国推动地区热点问题的政治解决，积极开展南南合作，增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为维护世界和平和地区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展现负责任大国担当。

中国坚定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和经济全球化的正确方向。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成为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截至 2023 年 1 月，累计已经同 150 多个国家签署合作文件。中国还是 14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货物贸易总额居世界第一位。中国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为世界提供新机遇，更好惠及各国人民。